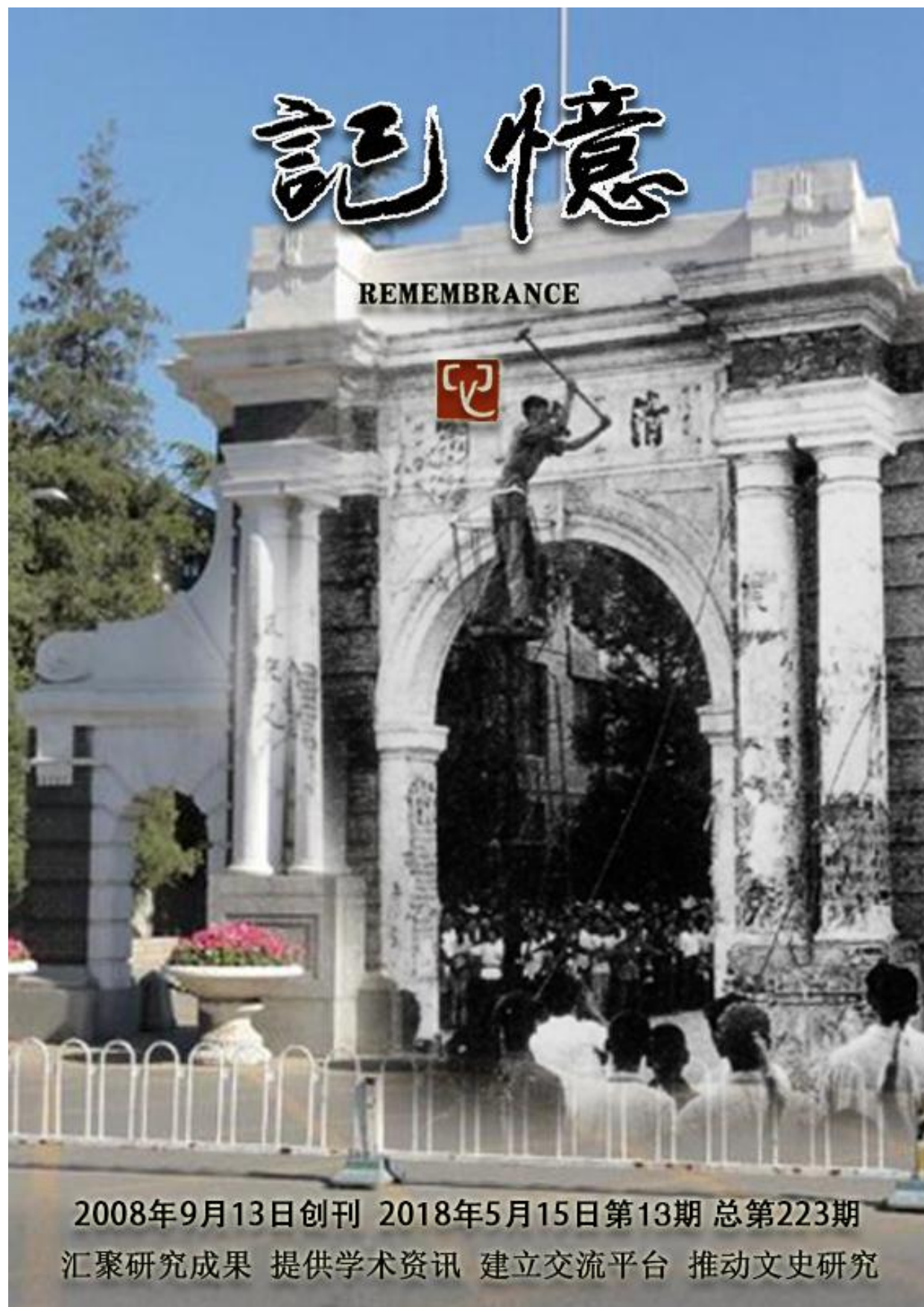


記憶

REMEMBRANCE



2008年9月13日创刊 2018年5月15日第13期 总第223期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史研究

《记忆》223期

北京高校文革研究专辑（二十）

目录

【罗文胡注】

罗征启 清华大学文革回忆录（四）——“罗文李饶反革命集团”是怎么回事？

绑架：1968年1月30日

先农坛，防空地下室

神秘的武斗据点

被非法刑讯逼供。

三堡疗养所的囚徒

基督山伯爵助我逃出三堡

午夜逃亡，与狼同行

总部指挥救援，回到学校

家破人亡，逃离北京

逃难到陌生的故乡（节录）

清华，我回来了

清华两派的前途——宽恕与和解必胜

胡鹏池 罗征启《清华大学文革回忆录》（四）评注

【资料】

附件一 丁正明、金水高：夜闯三堡

附件二 关于“护送行动”的微信讨论与相互印证

【本刊声明】

【罗文胡注】

清华大学文革回忆录（四）

——“罗文李饶反革命集团”是怎么回事？

罗征启

作者说明：本文原是“昙花一现八百天”的最后一部分，但因块头太大，内容太多，而且和“八百天”有所不合适，故提出单列。

“罗文李饶反革命集团”案件也许是清华在十年动乱中，最荒唐、最胡闹的案件了。因为这几个受伤害、受委屈最严重的老师，根本就不能算是个“集团”。而且他们之中，除我外，即便以言治罪、以文治罪、以思想治罪都不可能的。何来“反革命”，又何来“集团”？案件的几个当事人有的终生伤残，有的含冤去世，身心受到极大的伤害。我是这个“反革命集团”的首要分子，现在还侥幸活着。我想，我有责任将我在此案件中经历的实情记录下来，以此向清华师长、师兄弟、姐妹们作个交代。

注1 1967年清华校内分两派：一派是井冈山兵团总部（因其核心的战斗组以林彪指挥的“28团”命名，故自称“团派”、“老团儿”），另一派是井冈山四一四总部（因成立于1967年4月14日，故简称“四一四”、“老四”）。团派以蒯大富为首。因有中央文革和毛泽东的撑腰支持，是掌权的。“四一四”是比较温和的一派，是在野的。

因为学校许多党员干部和老师倾向或支持“四一四”，“团派”十分恼火，一直想搞点事件出来，用于压制支持“四一四”的党员与干部。于是就搞出了一个“罗文李饶反革命集团”。罗是我，文是文学宓（统战部副部长），李是李康（教务处副处长），饶是饶慰慈（党办副主任）。

绑架：1968年1月30日

1968年1月17日，团派在清华大礼堂开大会批判罗征启、黄报青，罪名是搞“假四清”。

正在家里养病的黄先生闻批判声，从五楼窗口跳出，堕地身亡。

我也仓皇逃出清华园，一直躲在人民大学新闻系的摄影实验室里。（我姐夫是人大新闻系的老师。人大当时也分两派，一派叫“三红”，另一派叫“新人大公社”，两派的矛盾，没有清华那么严重。我姐夫是“新人大”的，大体上也是地派观点，这个暗室属于他们管。）我在实验室里安了张床，拉上厚厚的窗帘。暗室里听不到吵闹的高音喇叭声。但是又进入了一个没有声音、没有光亮的世界，也够恐怖的！就这样在黑暗里过了一天又一天。姐夫每天给我送饭，给我讲一些新闻，我的吃喝及与外界的联系就全靠他了。

我的妻子梁鸿文本人仍留在学校。虽然，她可以见到天日，但我相信她的处境比我好不了多少。

1月29日，鸿文也来到人大姐夫家，当晚她留在姐夫家。我们在姐夫家见了面。十几天来，一直比较平静，我们都麻痹了，觉得好像没什么事了。于是商定第二天中午到托儿所去接孩子，然后到日坛公园玩一阵，再一起回我父母家吃年夜饭。

注2：当时，北京的红兵运动，已经分裂为两派。一派以航空学院韩爱晶，北京大学聂元梓为代表，因航空上天而称为天派。而另一派以地质学院王大宾、师范大学谭厚兰为代表。因地质学院而成为地派。清华蒯大富哪一派都不是，但因和韩爱晶、聂元梓关系比较密切，一般也被称认为是天派，而414自然就被认为是地派的了。其实他们都不承认自己是天派或地派，只能是观点比较接近，关系较好。

晚上印甫盛、万润南来看我，我向他们说了明天的计划，万没有作声。

印低声说：“有点儿危险。”

我说：“回家吃个年夜饭，吃完就走。”他没有再说什么。

1968年1月30日，虽然这天是个大晴天，阳光灿烂，但在我的记忆里，却永远是“阴冷灰暗”的一天。

这天上午，鸿文接到女儿，我们一起到了日坛公园。这个公园很大，离我父母家很近。文革之前，我们将孩子放在父母家附近的一个托儿所。平日，由父母接送和照顾这个孙女。鸿文去了四川绵阳建设三线分校后，周末就由我接送和陪孩子过，给我父母“放两天假”休息。我经常带女儿去日坛公园。那里有个儿童游戏场，我们常常玩上两三个小时。文革开始，这规律就打乱了。有时一连几个星期看不见孩子，好想啊！

1月30日这天比较早接了孩子，我和女儿都很高兴，在日坛公园的儿童游戏场玩了两个多小时，然后一起回家。

我父母本来住在现在的北京火车站附近一个传统的三合院里。大门是一座殖民地式的门楼，进门是以木板为材料的影壁，后面是北、东、西共十几间房子，房子是父亲买下来的。父亲当时在锡兰驻华大使馆（即今天的斯里兰卡驻华大使馆）工作，虽然与我国公安部门联系的，但当时不准暴露。我们家里除了父亲和我以外都不知情。

文革开始，父母就被当地的街道“积极份子”批斗。父亲因在驻外使馆工作，故被认为是里通外国的“汉奸”。母亲虽然和农村毫无关联，却被认定是“地主婆”，每天早上扫马路。家被抄，自住的三合院，被四户“积极分子”分了。全家五口人（我的父母亲、我的女儿、我的两个弟弟。一个弟弟59年响应号召，到黑龙江开发北大荒。五年后回来，在第一机床厂当工人。另一个有些弱智，勉强在读初中）被赶到附近农业部大楼脚下一个大杂院里一间半朝北的十几平方米的小房子里。暗无天日，没有厕所——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家的情况还不是最糟的，还有许多比我们更糟。我们还可以苦中作乐，高高兴兴地准备过个年，两个姐姐也全家都到我父母家一起来过年。

我和鸿文各骑了一辆自行车。我的车前大梁上放着一个小座椅，女儿坐在上面，这是

当年北京最普通的家用交通工具。我们到了大杂院的门口，我推开门，连人带车一起搬过大杂院的门槛。这个动作以往重复过多次了，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问题。但是当时，怪事发生了，女儿坐在车上的小座椅上，突然无缘无故地大哭不止。我以为车子的什么地方碰伤了她，或弄疼了她。我仔细检查，没碰到她什么地方。四岁的孩子应该听得懂我的话了，但是不管我说什么，她只是哭。我赶紧把车子支好，把她抱起来放在地上。她抓住我的衣服不放，我只好抱着她，直到她的爷爷奶奶出来接她了，她才止住哭，但一边走一边回头看着我，好像怕我走了一样。我感到很奇怪，是不是要发生什么事情？这是不是一个凶兆？

我站在离大杂院大门口约30米的我家的门前，停好了车。我低头看我的车，没有抬头，眼睛却往大门口方向窥探。靠近大门口的第一家是新搬进大院的，这家有多少口人我也不知道，但他们有一个女孩叫小青。这时她正和家里的大人说话。我进到房间不久，小青就蹦蹦哒哒的进来对我母亲说：“罗大妈，我妈让我出去买点东西，你要不要带什么？”一边说一边眼睛滴溜溜地转，扫视我家屋里的情况。我更加怀疑。我母亲对小青说了什么我也没听见，只见小青蹦蹦跳跳地走了。如果我果断地骑上车就走，大概还来得及。而我犹豫了一阵，这正是我性格上的弱点：遇事犹豫不决。

以后，我从各种途径得到的消息证明，当我进门的时候，对面农业部大楼上有三、四个人在盯着我家，加上小青这个密探，报告我确实回到家。他们一方面通知清华派车派人过来，另一方面监视我的动向。我虽感到有危险，但不能准确判断是什么危险，以及危险来自何方？而我女儿则敏锐地感觉到了危险。她还小，无法用语言表达这种微妙的感觉，所以用反常的哭声引起我的警觉，但我没能体会到。

我一直心神不安，一句话都没有说。女儿的感觉可能更强烈，一直依偎在我身边，生怕我跑了。快吃饭了，掌勺的大姐夫已开始吆喝准备吃饭，我没有出声，我不愿惊动大家，尤其不愿惊动两位老人和女儿。心想快点吃完就走。唯一察觉我有心事的是母亲，她靠近我低声问：“你回来有没有危险呀？”我说：“应该不会，越南前线春节还停战呢！两派吵架，没事，我吃完就走。”

我们谁都不知道，危险已近在咫尺了。

晚上八点多了，年夜饭还没有开始，突然敲门进来几个人，说是查户口的。其中一个人穿着军大衣，看起来很眼熟，但想不起来，在何时何处见过（我立即使劲地想）。后面还有两三个人，他们的眼睛在这间不大的房子里搜索了好一阵子，像是看看有没有其他的通道可以让我逃跑的。这时，我突然想起了，这个穿军大衣的年轻人是学校修建队的一个工人，以前我们“劳改”时他看管过我们。他的身份似乎是团派总部保卫组的。想到这里，我知道，这下子我完了，他们都是冲着我来的。

这伙人退出去径直向大院门口走去。看见院子里突然来了许多不速之客，大杂院里许多邻居都出来看，也都感觉气氛不对。

母亲急得眼泪汪汪。隔壁一对夫妻，江浙一带人，讲上海话的，平时和我们家关系很好。他们用上海话和我母亲说了些什么。我母亲是上海长大的广东人，会讲上海话。这时她跑过来低声说：“隔壁那位叔叔婶婶说，这些人是冲着你来的！”

我说：“是的！”

母亲说：“他们叫你到他们家暂避一下。”

我说：“不了，替我谢谢他们，我不想连累更多的人。妈妈，以后你们对院门口小青那家人要小心，他们也是监视我们的。”说完我就向门口走去，当时我没有穿棉衣，只穿一件毛衣和一件棉背心。

母亲说：“你穿上棉衣，我给你拿去。”我说：“来不及了，我不想让亲人尤其是孩子看见我被别人抓走！妈，请你替我照看好鸿文和孩子，拜托了。不好意思，给二老增加负担了。”

我加快向院门走去，拉开院门看见外面有四五个人，包括那穿军大衣的人，形成半圆的包围圈，两边各一个人跳上来按住我的胳膊，并且推着我走。

我说了一句：“请等一下，我母亲要给我拿件棉衣来。”

一个人厉声说道：“用不着，我们有棉衣，冻不死你，快走！”

向前走了十几步，从右侧农业部大楼的正门那条胡同里飞驶出一辆吉普车，嘎的一声急刹车，停在我前面。立即，我被几个人从后门扔在冰冻的车底板上。

几个人飞快地上车，几只脚踏在我身上。一个人用块布蒙住我的眼睛，并且阴森地说：“你老实点！不听话，我们就不客气了！”他们还没坐好，车子已经开动了。

我很“老实”，一动不动，尽量凭感觉判断方向。北京东城是我读书成长的地方，但是转了几次，我就失去了方向。

先农坛，防空地下室

大约20分钟以后，车停了下来。周围很安静，连公共汽车的声音都没有。他们经过短暂的交换意见之后，把我拉起来，又把蒙住我眼睛的破布扯下来。汽车里没有灯光，看不清这几个人的长相。只听到一个北京口音的人说：“老实跟我们走，不管碰到什么情况都不许出声，不听话别怪我们不客气，下去！”

我下车后用眼睛左右扫视，发现这是开后门的吉普，车上连我和司机一共七个人。我们站在车行方向的右侧路边，向左看去正是南长街的牌楼，于是，我知道我的位置是南长街的路东，离牌楼约50米。他们发现我在左右张望，其中一人推了我一下：“看什么看？走！”我被夹在他们当中向北走去。

一路上没有人说话，路上既无车也无人，可能因为是年三十，周围出奇的安静。本来我很希望碰上巡逻的解放军，我会挣扎着跑向他们求援。但是后来我又想幸亏没有碰上解放军。如果真的碰上，就算我够胆挣脱这六条比我高大的汉子跑到解放军跟前，两三个巡逻的解放军战士也不一定对付得了这五、六个大汉。

一行人过马路到了路西。又走了十几、二十步，进了一条弯弯曲曲的小巷。他们敲门进了一个小院，小院的情况没看清楚，两眼又被他们用同一条脏兮兮的破布蒙上。我被推进一间小空房间，从蒙眼破布的细小缝隙中看到一丝灯光，因而知道房间中悬挂着一盏电

灯。但从感觉上知道，房间虽然不大，却是空荡荡的。这时他们又把我双手在背后捆绑起来。严冬时节，没有穿棉衣的我，连续打了几个寒噤。

还是那个北京口音的说：“老实呆着，别出声，别乱动。”然后他们锁上门，到旁边不远的另一个房间去了。我还能听到他们说笑的声音，时不时传来一阵阵哄笑。我猜他们在又吃又喝，好不惬意。

大约一个多小时以后，有人敲大门。开门以后，我听得到他们在房间里商量了一会。过来两个人，带来一件棉大衣，他们帮我穿上。这一个多小时，一方面我被蒙着眼看不见，另一方面又被命令“别出声，别乱动”，我快冻僵了。这件棉大衣救了我的命。穿上棉大衣，还没暖过来，房间的门响了。走进两人。一边一个押解我出了房间，又出了院门，听他们和里面的人道别。

听到门关上以后，有个人扯下蒙着我眼睛的布。一行人又走上南长街，向着长安街方向走去。没走几步，就看见那辆吉普车。但车停在南长街路西，车头向南，他们让我上车，但这次可以坐在后面的座位上，两只手也没有绑住，只是眼睛又被蒙上了。

我又努力地辨别方向。南长街转右，应该是天安门广场。连汽车的声音都能听出来是在一个空旷的大广场上。远处还有稀稀拉拉的爆竹声，点缀着过年的气氛。

我的女儿，我的亲人们，他们吃过年夜饭了吗？应该是吃不好了。这个年不好过啊！后来我得知，我的妻子和姐夫，我的母亲，分别连夜去到蒯大富的总部，并且问他们要人，当然只能无功而返。

之后，车向左拐向前门，又一直向南开去，似乎没有变过方向。最后停下了，应该是还没有到永安门的某处。副驾驶座位上的人出去了一会，听到喊了一声：“行了，快点！”

于是我又被两个人左右押解着进了一个可以两向开的摇头门，迎面一股暖气。走了几步向右转，又经过一个摇头门。突然，两边的人喝道：“快点！”把我架起来，两脚悬空了。他们好像在跑一样，气氛很紧张。

奇怪的是，我闻到一股医院的味道。难道我被带到一座医院？这一带没有医院呢！

又进了一个摇头门，我那悬空的脚踢到一步台阶，我知道这是楼梯了。那两个人继续架我快步跑上楼梯。加上后面跟着跑上来的几个人，在空荡的楼梯间，脚步声音很大、很急促。刚开始我还默记着“休息板、二楼、休息板、三楼——”后来被这紧张的气氛打乱了，最后不知在几楼停下。又经过一个摇头门，进入一个空旷的大厅。

他们在大厅的边上找了一间储藏室，把我塞进去让我坐下，并且说：“老实呆着，不许乱动。”说完了，锁上储藏室的门就走了。

他们似乎忘记了我的两手并没有绑上。过了一会，我偷偷的扒下蒙眼布，从门缝看。外面灯光虽然很弱，但能看到似乎是一个球类练习厅，我看见一个篮球架子。我想可能是先农坛北京体育代表队的大楼。

又过了个把钟头，他们又来了。开了储藏室的门，把我拉出来，走了几十步，我猜大约是储藏室的对面，打开一个门，把我推进去，扯下蒙眼布。我看见原来是一间厕所，有便桶、浴缸、洗手盆，相当宽敞。马赛克地上铺了一层稻草。北京口音的又说：“今晚委屈你，就睡这里吧。”

我回头，大厅里灯光是昏暗的，我看了看墙上有没有电灯开关。

那个人看见我这个小动作就说：“开关在外面，不许开灯，睡吧。”说完锁上门就走了。

这一夜，我就躺在冰冷的厕所马赛克地上，居然很快就睡着了。

在睡前，我做了一件事，检查我身上的东西：清华的工作证、工会会员证、一张十元和一张五元的钞票。我想他们可能会检查和搜走我身上携带的东西。我下意识地感觉到，我随身必须有个身份的证明，还要有点钱。因此，我把我的底裤脱下，前后反过来再穿上。我的底裤后面右侧有一个小口袋，掉过来穿，这个小口袋就在左前方腰带附近。估计他们不是很专业，不会搜到那里的。我把工作证和五元的钞票放在这个小口袋里，把十元钞票和工会会员证等其他物品放在上衣的口袋里。后来，他们并没有搜查，但是借着问我要饭钱时，看了看我口袋中的东西，搜走了那张十元的钞票，说是我的伙食费。我藏下的工作

证和五元钱没被他们发现，这在我越狱逃跑时起了很大作用。

我被“嘭、嘭、嘭”打球的声音吵醒了。大厅里的灯全亮了。因此，透过门缝和门上亮子射过来的灯光也多，厕所里亮了许多。

我用洗水盆水龙头的水漱了口，洗了脸。没有毛巾，只好等待自然干。

我真应感谢清华马约翰先生，他在我们一年级开学上课的第一天，亲自到班上讲课，怎样吃饭、怎样洗澡、怎样洗脸等等。我们许多人一直是按照他教的方法，洗脸用冷水，洗澡用冷热水交替洗澡。因为一直按照马先生的教导洗脸洗澡，所以在目前极其恶劣的环境下，也可以保持健康不病。文革中，我是“黑帮”，不许进浴室洗澡，只得改用冷水洗澡，冬天用冷水擦身。

一边等待脸上自然干，一边揣摩着自己的前途命运。

八点半，大厅里有些动静，有打球的声音。从钥匙孔里看出去，大概因为是年初一，打球的人不多。

突然有人推厕所的门，而且讲的像外国话，又用普通话说：“把这个门打开！”过了一会儿，门打开了。我看到四个穿运动衣的人，为首的是少数民族，大概不是维吾尔族就是哈萨克族。他用生硬的普通话说：“怎么，这里有人？”没等我说话，他上前来打了我几个耳光，还说：“肯定不是流氓就是小偷，打！”那几个人中有两个人也上来打，好在他们手轻。

我马上争辩：“我不是流氓小偷，我是清华大学的干部，是昨天夜里井冈山蒯大富把我抓来的，今天他们不知为什么还没有来。”

其中没有动手的那个人（也是少数民族）看了看我，大概看我不想流氓小偷，他们就用他们的语言交流了几句。

为首的对我说：“蒯大富不好，但是我们现在也不能放你，如果他们今晚以前，还不来，我们就放你走。”

我说：“谢谢！”

他们又锁上门，走了。

但是没等到晚上，蒯大富的人就来了。他们给我带来一些吃的，给我约半个小时吃饭。

半小时后，他们进到厕所里，也不说话，又把我眼睛蒙上，还是一左一右两条大汉架着我走。走了几十步，突然喝声：“快点！”我又被悬空架起，这次是下楼梯。

我默默地注意着多少层。大约是六层或七层，然后把我放下，向前推着走。突然，一阵阴风袭来，我猜我到了一个阴冷潮湿的地方，可能是地下室。但我因穿着棉衣，感觉比昨天晚上好多了。他们把我向前推了几步，叫我转身，坐下，把蒙眼布拉下。

原来是防空地下室，我坐在墙下一条约40公分高的地梁上，小房间黑呼呼的，挂着一盏低瓦数的电灯。在灯下放有一张小方桌，两个人分坐在桌子两边，两侧前方还各站两个人。他们在较亮处，我在较暗处。两边站着的大汉，都歪戴着一顶棉帽，一个护耳在前，一个护耳在后。他们无非是想造成一种震慑的恐怖气氛。实际上我倒觉得他们所营造的气氛，真像威虎山上土匪窝里的气氛，一点也不恐怖，反倒有点滑稽。

我发现审问我的人和昨晚到我家里抓我的人不同了。昨晚大部分是修建队的工人，今天大部分是体育代表队的学生。我平日管文工团较多，与体育代表队接触不多，但是大体上能分辨工人和学生。以后接触的代表队学生，多是击剑队、航海队和羽毛球队的。羽毛球队的是几个华侨同学。他们虽然有时会动手打人，但都出手不重，至少对我是这样。

“审问”进行了好几个小时，到八点多钟才结束。在这几个小时里，他们时而急风暴雨，声色俱厉，时而和风细雨、和颜悦色。我知道这叫做变换方式，使受审人心慌意乱，说出他们要的东西。但是他们要的，也问得最多的，是414总部内部的情况。他们没想到我一次总部的活动都没参加过。他们也没有想到，无论交替使用各种手段以施加压力，一个人在巨大压力下，一个半小时以后，就没有什么感觉了，也就不感到恐怖了。

大约八点半以后，他们结束了审问，给我吃了点的东西，又把我蒙眼架回到那间厕所。

这段时间里，我想得最多的是默默地祝愿我的亲人、家属，不要受到恐吓、虐待，我宁愿多承担一些。我不信教，所以我不会祈祷或许愿，不会祈求上帝或观音菩萨保佑。但

是，我对佛教的因果报应之说却很认同。所以当我独处的时候，我时常在想，我有什么不好的思想或行为，该受如此严酷的报应？想来想去，可能是对我们在思想工作当中，一些“左”的思想和行为的一种过“左”的报复。

次日上午九点，他们送来早餐。吃过以后，又蒙上眼睛，没有上下楼梯，走了二三十步进了一个门，门里非常热，我感觉至少有二十三四度。拉开蒙眼布，我看到是一个很宽敞的房间。我猜想这是先农坛北京体育代表队运动员的宿舍。按当时的标准，算是相当豪华了。

为首的一个学生指着一把坐椅，让我坐下。因为室内温度太高，他们都除下帽子和外衣，我能看清他们的面目。房间里只有四个人，我预感到又会有什么变化，比如说改换地方之类。我也脱下棉大衣，看着他们，接受审讯。

结果并没有太多的问话。他们提出几个问题，我回答了。其中大部分是前一天在防空地下室里问过的。他们问过以后，让我写成材料。我故意拖延写了很长时间，他们也不在意。天渐渐黑下来，他们又让我看前一天的审讯记录。并在每一页上签了名，按手指印，有改的地方也要签名按指印。看完厚厚的一本记录，天已完全黑下来。他们又给我吃了点东西，穿上棉大衣，蒙上眼睛，又被送回厕所，锁上门就走了。

又过了个把小时，我估计是八点多钟，厕所门开了。他们一句话不说，蒙上眼睛，一边一个人，又把我押出厕所。

突然，左边的人大喝一声：“快！”我被悬空架起来，进了楼梯间的防火门，快步跑下楼，我以为又要去防空地下室。但跑了四五层楼梯以后，出了摇头门，到了有医院味的地方。他们像跑一样，跑出去这条长廊，出了摇头门，再经过一道门。就闻到室外的味道。虽然冷一些，但新鲜空气还是比较舒适，他们推我上了汽车，我猜大概还是那辆吉普车。汽车启动，我默默地记着转弯的地方，但是不一会，我就失去了方向，不知道这辆驶向何方。

这时，我思考的另一个问题，那地方是不是先农坛北京体育代表队？这个大楼的平面

应该是这样的：进一楼入口大厅以后，正面是楼梯，或者还有电梯。右边是医务室，我猜左边应该是食堂或办公室。二到五楼是运动员宿舍。宿舍东西两面尽头各有一个防火楼梯。医务室东的防火梯通到防空地下室，正面楼梯和电梯直达顶层的运动大厅。我觉得我的设想是相当完善的。

汽车走了个把小时，突然，我捕捉到一股气息，一股味道，是清华园的味道！这是我近二十年学习和工作的地方，不会错的-----

神秘的武斗据点

早就听说，设在第一教室楼的前哨广播台是团派的一个重要据点，今日深陷其中，得识其庐山真面目。

这是我们当年三校建委会一工区的最后一个项目。当时，大部分同学都已回去上课，只留下我们少数几个同学再多干了些天。这座第一教学楼，也可以说是“我们盖的”。我现在一点恐怖感都没有，一边走一边在想，这个楼的砖瓦灰沙石，说不定还是我买的呢。

进门以后，走过大厅，上了三跑楼梯。楼梯都用课桌和椅子堵住，留下很窄的一条缝，只够人们侧身走过。楼梯不是封闭的，不符合今天的防火规范。在楼梯向着二三层楼走廊较宽敞的空间，还放着许多座椅，估计是准备发生武斗时就可以随时用来堵塞楼梯，便于防守。在以冷兵器为主的武斗中，这样的防守是足够了。教室的高度与厕所等服务房间的高度不同，所以利用三跑楼梯的休息板作了夹层入口。这个设计我们以前是知道的，我在搞毕业设计时还专门来看过，想不到今天我被关在这里。

我被押送到一个夹层里，夹层的里面是广播台“重地”，当然是“兵家必争之地”。所以我也明白不会允许我进入的。我被命令留在靠近楼梯夹层入口处的小房间里。这里没有暖气，里面的广播室有煤炉，我可以嗅到煤火的味道。

我的小房间连门都没有，只用几个小桌子、椅子堵塞。我看不见外面，当然，外面也

看不到我。虽然没有火炉，但不算冷，就静静地坐在那里等待事态的发展。我听到里面房间有几个人在说说笑笑，但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也不时有人出入这个夹层。小房间很暗，只高高吊着一盏低瓦数的电灯。

我随便扫视了这个小房间，一张双屉书桌、一把椅子，还有一个空的已经破烂的书柜。我不经意地拉开抽屉一看，里面塞了许多烂纸，下面露出一本油印的小册子。上面有图像及说明，但是无头有尾，当中还有缺页。我快速翻看，却倒吸一口凉气。原来是本教授怎样打人，挨打怎样防备的小册子。因为没有前面几页，故不知其名。

册子上描述：打人要用拳头和手掌，不要用棍棒等物，尤其不要用铁器等硬物。可以打腹部、胸部等肉厚的地方，不要打头和肉薄的部位，这样可以不留痕迹，否则要闹出大事；如果用铁木等硬物打，最好用厚布包上-----

虽然此前对前哨台有许多传说，而且后期这里出过几条人命，打死打伤几个同学，尤其后来在蒯大富的指挥下使用步枪、手榴弹等武器杀死、杀伤多名前来制止武斗的“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闯下了大祸，造成“井冈山”以至于整个红卫兵运动的覆灭，但是我在“前哨台”短短的两个小时里，却没有感到这个据点隐藏着什么大的杀机和能量。

我听到里面的人在讨论，有时在争论着什么问题。虽然我很注意听，但听不清楚，断断续续听得到一两句话：“反正我不赞成打人。”“我们也不赞成打人，但有时情况会失控。”-----[注 01]

两个小时之后，来了几个人，搬开了桌椅，叫我出来。又蒙上我的眼睛。出门以后走到校卫队门前，推我上了车。车子启动，听声音，还是那辆车。我从转弯的方向和气息判断，车子一直在校内和离学校不远的路上转，转了大约半个小时左右，忽然我嗅到了一股非常熟悉的气味和信息，我立刻就可以断定是音乐室附近。

虽然现在听不到熟悉的琴声，但是从入学的第一周起我就开始在这里向一名叫普洛武鲁夫斯基的白俄学小提琴，每天来练习一、两个小时，风雨无阻，除非外出实习，从不间断。可以说，我在清华学习的第一是建筑专业，第二是小提琴了。

车停了，“下车！”一声命令。但我双眼被蒙上，虽有命令，但不敢动。大概还是那辆吉普车。我被两个人半推半扶地从后车门下了车。又被左右架着押解进了门。一股烧木材的味道扑面而来，还有刺鼻的烟味，大概是刚刚在生煤炉子。又左拐右拐了几个弯道，终于停下来，拉开蒙眼布。我看到我在一间没有窗，只有一个大木门的房间。房间里没有火，所以没有烟味，只有一张小木床，上面放着一床被和一床褥。这里是哪里呢？

这时，我看见大木门是实木的，而且是精工制造的，门框周围有很好的线脚。我认识这里，我到过这里。再结合音乐室的信息判断，是化学馆。押解我的人开口了：“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我很老实，说：“是化学馆二楼正门入口大楼梯下的房间。”

“你这老小子，怎么知道的？”

“我毕业设计的题目是清华的土建馆，学校的老房子我都观察过。”

我不敢说我的毕业设计的指导老师是黄报青先生，那肯定会引起新的风波。当时黄先生叫我们参观清华的老建筑，有时带我们参观，边看边讲解：搞设计一定要注意，所有的建筑元件都应该是成一系列的，统一的。不能大体型是中国传统的，小建筑是西洋古典的，线脚装饰是阿拉伯的，室内摆设是埃及的。这就乱套了。黄先生现在已不在了，可是来到这里，我仿佛又看见他站在前面侃侃而谈。

“听着！”一个陌生的声音，把我从对老师的怀念中拉了回来。他边说边打开大木门，前面是一条黑乎乎的走道。“现在这里很冷，等会儿我们会给你拿个木炭炉来取暖。过来！”他叫我走出大木门，到了走道上。就在大木门的门口，叫我掀起一块大铺地石板。一股臭烘烘的味道，我知道这是一条管道暗沟，主要是走暖气管道的，向西通到化学馆和音乐室的一个旱井。到冬天供暖气的时候，那个旱井还冒热气呢。我马上一个闪念：这条管沟到那个旱井可以逃跑呢——

“听着！”他又打断我的遐想。这是你大小便的地方，我们在前面，有事可以敲走廊左边的门。今晚就这样了，你睡吧，但别关灯。”

在我睡前，我的“监护人”拿来一块60公分见方的铁板，上面堆着一些烧红的木炭和木柴，放在房间中央，转身关上门就走了。

我躺下没多久，就感到迷迷糊糊，出现许多幻觉：我看见我的母亲，我向母亲走去，似乎跌倒了，母亲不见了——这样的幻觉反复出现，为什么，我在哪里？忽然，我明白了，这是八九岁的时候，我不舒服，出现幻觉，我去找母亲，看见她以后，我叫声“妈”！扑过去，没有知觉了。

“煤气！”我惊醒了，感觉心跳加快，头疼，头晕，但思维还清晰，我慢慢起身，披上棉衣，打开门，刚才还觉得臭烘烘的暖气沟，现在却似一股清新的空气。我走到左边一扇门，用力敲了几下。

立刻有人问：“什么事？”

我说：“煤气！煤气！——请你们把木柴和炭拿走！”

他们也没说话，把炭火拿出去，又关上了门，捣弄了一阵桌椅家具。又睡下了。我躺了一阵，确信不会有煤气了，才进入梦乡。快睡着时，我想：我又逃过一劫。

被非法刑讯逼供

化学馆是清华早期的一座建筑物，它雄伟孤傲，远离其他的教学行政建筑，紧靠校园的北墙，从校园的西北角，冷眼看着我们，带有一些神秘感。我在清华学习工作多年，除了做毕业设计时来这里观察过，就是这次被抓来关在这里了。许多同学只知道这是化学馆，却从来没有进去过。

现在，神秘感变成了恐怖感，尤其到了夜晚，如果没有“审讯”，那就一点声音都没有，只听到自己呼吸和血液流动的声音。这时才体会到，没有声音——连噪音也没有的世界是最恐怖的。这种效果，可能是连囚禁我的人也没有想到的。如果这种“万籁俱寂”的“静音”时间长了，可能人要发疯的。

我开始面对被刑讯逼供的一段日子。

我承认，我并不十分相信那个阶段我的记忆。因为那时候我的思维是处在一个高度紧张、混乱的状态中，许多记忆可能是相互矛盾的。

最让我迷惘不安的是，打我、骂我的年轻人是大学生吗？是敌人吗？我该如何应对？尤其是当他们用刑越来越重的时候，这样的问题就不断浮现。我知道，如果他们失手致我残、致我命的话，我只好认倒霉，而这种倒霉事不会有结果的。但是如果打你的人是敌人，是日本鬼子，是法西斯匪徒，那就另当别论了，而他们却是我们的学生！

还有一个在审讯中经常碰到的问题，他们常说：“如果你的态度好，敌我的矛盾可以转化为人民的内部矛盾！”这是一个错误的命题，而且逻辑混乱。后来，工宣队和军宣队也经常这样讲。本来没有问题，他们可以乱扣帽子。你不同意，就是态度不好，就可能“转化”成敌我矛盾。

我把老团对我的刑讯逼供分为三个档次：

第一个档次（最轻档次）是一般地刑讯逼供。我遇到的多数是这个档次，也就是说，多半是用拳掌打击，不用器械重物。

四人帮倒台以后，我见到文学宓、饶慰慈，他们所受的刑罚重得多，有的伤势惨不忍睹，可能多是第二档次。

第二个档次是重刑逼供。这时他们会换几个人上场，这几个人是打手，残暴无人性。

对我用重刑的一个叫冯家驷（他们称“老四”）的打手（也是学生）就非常残暴，[注02]他一般打你后，听到你痛苦的喊叫声，他会露出得意的“狞笑！”他的行为让我读懂了“狞笑”这个词。

我在“前哨台”看到的小册子里介绍说，被打的人大喊出声，就可以将疼痛散开。另外被打时顺势倒下，别硬挺住，也是消散疼痛的办法。我在被打时就用了这一招，还真管用。

不过几次以后，就被“老四”发现。他狞笑着虚晃一下，我不知有诈，马上大喊一声，

然而他并没有出手。他看出我懂防备时，就在我身后 2 米左右的地上，放倒几张桌子、椅子，并对我说：“你看清楚，你如果装着被打倒，也是倒在这些桌椅腿上，你就装吧。”说完，趁我不备，一拳打在我胸上，我就倒在那些桌椅腿上，等于用木棍、铁器等打我。但他说：“这不是我打的，是你自己躺下去的。”这样一来，我就必须屏气挺住，而挺住的后果就是伤重些。至今我手腕上还留有当时受伤的疤痕。

有一天，大概是周末，他们放假休息，没有审讯。大约是下午三四点钟，不声不响进来两个人，不像学生，前面守卫的人也不过问。我坐在木板床上，他们站在我面前，命令我站起来。我刚站起来，他们中一个插到我身后，将我两手擒住，另外一个手里拿着类似手电筒包着布的东西，我明白他们是要下手打人了。我来不及思考怎样防范才能减轻伤害程度，他们就下手了。

他们用那个东西直接打在我肋骨之下的腹部，我痛的连喊都喊不出了，肚、肠、肝、胃像被撕裂般痛疼。他们从轻到重大概打了十多下才放开我，我没有躺下，像患佝偻病一样卷曲着身体——

我听见他们似乎在议论什么——也不知几时，他们走了——

留给我的是难以言状的疼痛和惊恐。我知道这算是重刑了。

一年以后，即 1969 年春节后，学校组织义务献血。我也报了名。在体检照 X 光时，我被照了很长时间。

医生问：“你的肝有什么病？”

我说：“据我所知，没病。”

“那你这块是什么东西？”医生又请来几位医生会诊。

一位医生问：“你这几年发生过什么事没有，例如肝病、车祸等？”

我问：“挨打算不算？”接着，我把这次被打的情况说了。

医生说：“你命大，你的肝已被打破了，就剩了外面一层膜，如果这层膜再破了，那就会大出血，就完了。”医生还是同意我献血。

两年多后，我被查出患了血吸虫病。从此，我不能献血了。但在检查时，发现那个凝血块已经被身体吸收了，未治自愈。

第三个档次（更高档次）是对身体和精神的双重刑罚。

在化学馆的前几天，虽然也用了刑，当他们的用刑目的不是很明确。有一天冯家骊说：“你的态度不好，逼得我们换一种方法对付你。我们准备明天开始罚你站。蒋南翔硬吧，站了三天三夜，怎么样，全招了。看你年轻，比蒋南翔硬，就多站一会儿试试看吧。”

第二天，果然开始罚站了。首先宣布了要求说：“我们也不问问题，不提示，你有要交代的就交代，不交代的就站着，给你两顿饭，站着吃，只有大小便允许动一下。我们三班，每班八个人陪着你，现在开始了。”

我本以为很简单。我记得幼儿园的时候被罚站过一次，什么原因被罚可不记得了。老师在地上用粉笔画过圈，不许出圈，大概半个小时就完了，得个教训是要听老师的话。

这次的罚站可不同了。我的手表一直放在褥子下。这天我戴上了，我提醒自己，一定得比蒋校长站得多点时间，他比我大20岁有多呢。

第一天过去了，还可以。脚和小腿有点发胀，但不严重。我很有信心，对自己能挺住很满意。拉撒大小便是到我的囚房门口的暖气沟去，他们并不跟着我。我尽量多耗点时间，用来活动腿脚。

第二天过去了，我觉得还行。腿脚还是发胀。上眼皮老往下掉，但我觉得我能挺住。我无论如何也得站得长过蒋校长站的时间。

第三天，腿脚非常疼、胀，另外就是困，想睡觉。有时候，站着睁着眼就睡着了。有时候他们跟着我说话，我听不见，他们大声喝骂，我才惊醒。有时候会出现白日梦。有一次，我甚至喃喃自语，被他们听到，大声问我是不是交代什么？我摇摇头。但是我觉得自己还行，能坚持这么久也不容易！

第四天早上，我一看表，72小时，三天了。这个“三天”，像咒语一样，一到三天我马上垮下来了。如果说蒋校长站了四天四夜96个小时，那我可能站到100小时也没问

题。但当时我知道，我就要全线崩溃了。

到80个小时了，这时我感觉挺不住了，身体和精神都不行了！

我看到监护和审讯的人在换班了，下一班有冯家驊！这时，我完全不行了，开始出现许多幻觉：我看到蒋校长和冯家驊手挽手一起进来-----

值班人拿来我的口粮让我吃时，我对他说：“我要上厕所！”

没等他同意，我就跌跌撞撞地往我的囚室跑去，没到已经掀起盖板的洞口，我就失去了知觉！

人声嘈杂，我渐渐恢复理智。我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他装蒜，没事！”

另一个反驳道：“心跳过慢是装不出来的，已经很危险了。”

这时，有一个人抬起我的头，要用调羹灌一些水给我喝。我无意识的一喝，却是一匙滚烫的水，烫得我立即大叫了一声！

睁眼一看，正是冯家驊狞笑着说：“我说是装的嘛，你们还不信。”

旁边一位穿白大褂的医生反驳说：“心跳过慢，不会是装的，还是要注意。”

从这天晚上开始，我被允许睡一会儿了。他们也没有再提罚站的事。

后来我问过文学宓、饶慰慈等，他们也都被罚站过，文学宓说他站了五天五夜。我说，我不如你。[注03]

除了允许我睡了一会儿以外，他们还给了几片药让我吃。一种是酸的，我认识是维生素C，黄色的发苦的则可能是维生素B，再有一种是白色小片，不知是什么。第一次吃了我睡下不久，冯家驊又“提审”，我昏昏沉沉不知说了什么。

第二天，他拿来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印甫盛讲过，林彪是极左思潮的总根子”，签名是罗征启，字像我的，但我不记得有这回事。

我马上冒虚汗，因为一方面我不记得我写过这张纸条，如果确实是我写的，那有可能还写过别的东西。同时，这说明我已违反自己定下的“只讲自己，不讲别人”，更不能“揭发”别人以减轻自己的压力的原则。还有，那张写有攻击性言论的字条涉及“林副主席”，

我们414战友内部还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就是死守“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这条线，现在这条线也破了。我马上说：“这话不是印甫盛说的，是我说的。”“那你写下来”，一个审问者说。“我写下来可以，这张纸条可要还给我。”得到肯定的承诺以后，我写下了这张条子。但是那张使我终身引以为憾的字条，也没有能收回。[注04]

我很难过，如果他们趁势猛追，那可能还有更大的斩获，但是，不知为何他们却停手了。

我在化学馆一楼“被审讯”了大约10—14天。

一天审讯结束后，他们给了我一盒晚饭，并说：“快吃，吃完收拾一下东西，我们要换地方了——”

七点多钟，我“被离开”了化学馆。

三堡疗养所的囚徒

三堡疗养院是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清华在远郊区修建的一个疗养院。地处居庸关后面一站，八达岭前面两（或三）站。穿过山沟峡谷有一条铁路，车站就在几条山沟汇合处的一个小平原上。

铁路和公路并行，有时在一个水平面，有时公路在上面山腰俯视着铁路。山沟里潺潺流水声，四季不停，因为冬季不结冰，水生植物很茂盛。山沟里长着许多广东人喜欢吃的西洋菜。以前我和我的堂兄以及几位广东同学常常来采摘西洋菜吃。附近的农民看见，颇不以为然，他们说这菜叫野芹菜或水芹菜，人是不吃的，喂猪的。

疗养院在火车站上方的一条最大的山沟里，在这里，我有一段传奇性的经历。

我被押解出了化学馆一楼北门，还是那辆吉普车，停在旱井附近。我从车子的后门上了车，又被蒙上了眼。从他们谈话声音来看，又换了人。有两个人口音像华侨。后来我撤掉蒙眼布以后，看清是羽毛球队的，我看过他们的比赛。大个子的体力好，技术一般。小

个子体力不好，技术较好。[注 05]我听他们中有人叫“蛮子”，不知叫谁。我蒙眼坐车有点经验了，感觉车子穿过礼堂前广场，向东出主楼前的东校门，再向东过铁路转向北，应该是穿过清河往昌平的方向。

大约行驶了一个小时后，他们扯下了我的蒙眼布。刚刚我感到车子左转弯，现在睁眼看出去，虽然天黑看不大清楚，但大体上看到路两边的行道树和路灯。行道树是迎面倾斜的，所以，这应该是刚转向昌平往西去南口的公路上，应该是 1964 年我“用心观察”过的地方。

1964 年我带学生到部队当兵军训时，部队带队的吴姓少校团长曾对我说：我们带兵的有一条要求，走过什么地方，就要熟悉这地方有什么特点。大到山形地貌。小到花草树木都要记得，到打仗时是很有用的。一会儿到达目的地后，我要考一考你，看你能记住多少。”他虽然没有考我（也许他忘记了），但我一路上却很用心地观察了，从昌平向西转向南口后，我发现沿途只有一个特点：就是路两边的行道树多自西北向东南倾斜，角度一样，非常整齐。这是北京冬季西北风的杰作。

这时大个子华侨望着我说：“喂，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我随口应声说：“好像是昌平往 200 号的公路上。”我感觉得到，不仅大个子华侨，车上几个人都有点吃惊。“嚯！你怎么知道的？”

我没有回答，因为我说了这句话，立刻就后悔了，我不该让他们知道我熟悉这一带的方位和地形环境。大个子华侨说：“还是把它蒙上吧！”

我觉得应该到 200 号公路了，但是车子没有向北转弯，那就应该向南口走了。又过了十几、二十分钟，向右（也就是向北）转弯了，听到采石场采石机的声音。从采石机的声音判断，该是过了采石场，进南口了，同时汽车的马达吃力地喘着气，一定是在爬坡，这使我更加肯定已经进了南口。方向是八达岭。那么，只能是去三堡疗养院了。

车子左右摇摆着，这肯定是走弯弯曲曲的盘山路了。大约半个多小时，车停了，有人在里面喊话，似乎是叫我们进去。车子又开了几十米的样子，大个子华侨说：“下车吧。”

同时把那条肮脏的蒙眼布扯下来。我下了车，往前即向北看，就是三堡疗养所无疑。但右手边多了一些没见过的平房。我们站在入口处的大桥上，下面桥洞的流水声依旧清晰可闻。这个大桥，一点也没变，只是在桥的东北角方向修了一座岗亭。

大个子华侨又开腔了：“喂！这是什么地方？”

我犹豫了两秒钟。我不能说“不知道”，但又不想说“知道”。最后我说：“我应该是来过的，这是三堡疗养院。但是东北面的一些平房，我没见过。”

大个子哼了一声：“你今晚就先睡在这边，明天再重新安排。”

房间里没有什么变化，只是多了一个大铁桶，是给我大小便用的。小便没有问题，大便可不“便”，每天要有一刻钟时间练“骑马蹲裆式”，之后，还要在他们监视下，把大铁桶拿到大桥外面一个常年流淌山水的泉眼外，把那个便桶洗干净。在化学馆的时候，我的“监护人”给我一条毛巾，一个牙刷，我认得这些东西是我家里的，一定是家属送来的东西。

第二天开始的“审讯”，又问了许多问题，大部分是老生常谈，有时候也有人动手打我几下。但总起来说，没有进展。

第三天，审讯完毕，已过了午夜，这是月光皎洁的夜晚。

我被送回“囚室”。关了灯，坐在椅子上冥思苦想：我到底犯了什么罪？为什么那么倒霉？并且，似乎思想上逐渐形成了一个想法，开始还是模模糊糊的，后来慢慢清晰了。

这时，走廊的门响了，我马上躺下，拉上被子，假装睡着了。脚步声近了，走到我的囚室门口，从门上的洞口射进电筒的光亮。我不动声色。灯灭了，脚步声远去，走廊的门又响了。一切归于静寂。这是“三堡”囚室里每夜必演的一个“段子”。

我刚起身，披上棉袄，想继续再坐一会儿，忽然听到窗外面有些动静，有人轻轻的敲了几下窗子。

这是一层的平房，窗子不高。我的“保镖”们在外窗台上用几块大石头顶住两扇可以向外开启的窗。要从里面搬开石块，开启窗是很难的，尤其再想重新关上更是不可能的。

这时我看见窗外的人影，把石块搬开以后又敲了敲窗子，做手势叫我把窗子打开。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打开了窗。那人背着月光，我看不清他的脸。从声音上判断不是知识分子，似乎是个文化不高的人。

“你是不是清华的？”那人问。

我点了点头。

“他们打你了？”

我不置可否。心里在想着：这人是干什么的？来者“善”，还是“不善”？不能判断，还是小心为好。

“你走不走？你要想走，我们可以带你到南口，或昌平。今晚月亮好，我们骑车带你走。”

“我什么都没有。”我终于说了一句话。

他说：“我明白你的意思。这样吧，我们就是想帮你一把，你肯定没钱也没东西的。你随便给点东西吧，你的手表、棉袄，有缘将来见面再说。”

我还是不吭声，我觉得这事有些不合逻辑，应该说，他无非是想要钱，现在我没有钱，他就随便要点东西，似乎不可靠。

我问了一句：“你是干什么的？”

“我在这里做工的。行！你再想想。如果今天你走，就过个把小时再来，或者明天再来也可以。也就这两三天，没月亮时这条沟谁也不敢走。要明天走的话，还是这个时间。”说完他把两扇窗推进来示意我扣好，他在外面把几块大石头又摆好，倏忽不见了。

我一直睁眼躺到天亮，毫无睡意，那人也没有再出现。

我分析了有几种可能：第一种可能：他们就是想要点钱，没钱要个手表也行。但是，如果中间碰到危险，他们会弃你而去，他们没什么义务要帮你。那人几次讲都说“我们如何、如何——”这说明他不一个人，还有同伙，一个人或几个人，都是不可信的，几个人还会起内讧的。

第二种可能，是我的“监护”人考察我的一种策略。无论是什么策略和什么结果，对我都是大凶的，没有好结果。我当时比较倾向是这种可能。

第三种可能，是团派内部有不同意见，有人想救我出去。但这也不合情理。“团派”这时正是如日中天，形势好得很，不会有这么严重的反叛思想和行为。

第四种可能，是“团派”想再搞出点事，比如说逃跑事件，或者出现一些意外伤害，或者借助外力（非学校内部的）伤害事故，没事也会变成有事。

这几种可能，都会搅乱我头脑逐渐形成的一些想法，我决定把这事挑开。

第二天早晨九点钟，审讯开始，今天是孙耘主审。[注 06]

他还没开口，我就抢先说：“我有些事想说！”

孙耘似乎有些吃惊。他问我：“是有什么东西要交代吗？我们有个安排，你配合我们的安排交代就行了。”

我说：“不是交代问题。”

孙耘有些迟疑，看了我一会，慢慢地说：“等一会再说吧！”他的表现，使我怀疑第二种可能性，因为似乎他不知道当中有什么特别的安排。

那天上午，“审讯”似乎马马虎虎地过去了。最后，孙耘说：“上午到此暂停。你说说，有什么事？”

我将夜里发生的事描述了一遍。当然，我没有说我估计有几种可能。

孙耘听了以后，没有做声。

午饭以后，下午的审讯又草草收场。孙耘又和我谈了一次话，他说：“你昨晚的选择是对的。我是说，你没有选择跟他们走，这是对的。这可能避过了一场大灾难。你知道，从南口到八达岭这条沟，不用说夜晚，就是白天，大车队都得结队而行。除了坏人，还有狼群。你若跟他们走，说不定会出什么事呢！”

我保持沉默，他说的是实话。但是，他的话冲击了我头脑里逐渐形成的计划。我要放弃吗？在以后的审讯中，即使是受刑逼问的时候，有时也会“走神”，想着我的计划。

当晚，孙耘又布置了一个计划，叫我锁上房门和窗户。“无论听到什么声音，也不许动，不许做声，直到我们给你信息。”

这晚，我当然也睡不好。直到夜里三点左右，走廊的门响了，脚步声走到我门口，敲了几下，低声说，“没事了，你睡吧。”

次日，情况有些变化，先是把我调到疗养院西翼二楼一间朝南的房间。后来，他们又发现朝南的房间可以观察到疗养院大部分的活动，尤其是晚上。如果有什么动静，他们不想我看到，只好用几只手电筒照射我的窗口，使得我看不到外面。这样当然还是不方便，于是把我调到朝北的房间。囚室在二楼，审讯在一楼西头朝北的一个套间。

最残暴的打手冯家驊又出现了，我认为这意味着他们的审讯又要升级了，至少又要施行一项新的计划了，审讯方式也将有些变化。

他们分成几个组，每组两三个人。这两三个人里面通常有一个人是打手，真正动手打人或审讯中用一些恶毒的恐吓性的语言来施加压力的，一般是这个打手。

我曾怀疑冯家驊是不是学生。我认为一个学生对老师下不了这样狠毒的手。然而后来了解到，他是一年级学生。而且他打我不是最狠的，打饶慰慈、文学宓更厉害。[注 07]对饶慰慈，根本不能提起此人此事。如果有人提起，她会全身颤抖，精神崩溃。

因为冯家驊又到了“三堡”，我估计不是好兆头。因此，我重新修订了我的计划，必须加快进度。

基督山伯爵助我逃出三堡

有两本小说是我青少年时就喜欢的书：一本是中国的《三国演义》，另一本是外国的《基督山恩仇记》。[注 08]这两本小说，我更喜欢的是《基督山恩仇记》，因为他描写的东西和我们的现实生活更接近一些。读《三国演义》，我崇拜的偶像是诸葛亮和赵子龙，而读《基督山恩仇记》，我崇拜的偶像是爱德蒙·邓蒂斯和法利亚长老。

我第一次看《基督山恩仇记》是1948年底。当时，我在北京读高中一年级。解放军包围了北京，每隔两三分钟，市区落一颗炮弹。学校提前停课放寒假。这时我的大姐不知从哪里弄来一套《基督山恩仇记》，一共厚厚的四大本。我们兄弟姐妹轮流看，个个在煤油灯下，开夜车读得津津有味。我就读了两遍。

共和国建立以后，这本书成了禁书。我考上清华后，还曾到图书馆查问这本书的下落。据说是根据上级指示，收进了“黄反书库”。

五十年代，在青年中流行一时的外国小说是《牛虻》等一些苏联的“革命”小说，[注09]我读起来总是觉得不如《基督山恩仇记》过瘾。我总是念念不忘大仲马的这部小说。

1959年，为指导学生文艺阅读及文艺创作，学校建立“文艺教研组”，由党委宣传部的常务副部长林泰任主任，由我任副主任，主持教研组的日常工作，从宣传部、团委、文艺社团和政治课调来几个人就开张了。

林泰是我的同班同学，入学时他已是党员，我连团员都不是。但是我一直身不由己地跟着他走，从系团总支，党总支、校团委和党委宣传部。总是他在哪里，就调我到哪里。他离开哪里，我就填补他走后的空缺，然后再调到他手下。但是说实在的，对党团政治工作，尤其是宣传工作，我是最不喜欢的，几乎可以说是厌恶的。此刻，我被任命为他的副手，搞文艺阅读、创作及宣传写作，我也不喜欢。但他在宣传部的工作太多，忙不过来，无暇过问，而我则借口自己看书太少，想利用这个岗位的小小空间，抓紧时间多读点中外文艺作品。

当时，我又想起《基督山恩仇记》，就利用“工作之便”到图书馆查阅。图书馆的一位老师很负责，亲自带我到三楼的屋顶阁楼（即四楼）的“黄反书库”里去查，居然找到两套。我用党委宣传部的名义借出一套，又连续看了几个通宵，把这厚厚的几本书看完了。当然，那段时间我还读了许多古今中外的文艺作品。也许我一生中，读书最多，密度最大的就是那几年。

“我想请你们帮我审查一下这本书。”我对宣传部领导和宣传部负责思想工作的几位

同事说。“把它列为禁书，关进‘黄反书库’是毫无道理的。我认为应该给一批书平反。这样才能使学生群众的文艺阅读走上健康的轨道。”

结果，大家陆续都看了，个个都开夜车，都说大仲马的这本书是本好书，应该平反解禁。但后来因为下农村搞四清和搞文化大革命，平反解禁这事就没人再提起了。

文革动乱中，因为宣传部遭到红卫兵多次清查抄缴，这套锁在宣传部一个抽屉里的书，已经无影无踪。文革后，图书馆的工作人员知道我回宣传部工作之后，曾多次打电话或上门“讨债”，但我没有也无法答复。这是后话。

我认为这部书最精彩的内容是：水手爱德蒙·邓蒂斯被陷害关进孤岛的死牢里，在那里巧遇了正在计划逃跑的法利亚长老，两人还成了忘年交。长老是一位绝顶聪明、很有学问和智慧的人。邓蒂斯在他的教诲下，受益匪浅。他们共同策划了逃跑的路线和办法，不幸在即将成功实施前，长老重病发作死去。爱德蒙通过他们两间牢房地下挖通的地道将长老的尸体搬到自己的牢房，睡在自己的床上，而把自己装进了长老床上的装尸体的袋子里。这样借着“海葬”逃出了孤岛死牢。之后，爱德蒙又按照长老生前的指示，找到了一大笔财富，买了地中海中的一座叫做基督山的小岛作为自己的领地，当起基督山伯爵，陆续完成了他报恩、复仇的计划。

故事曲折迂回，惊心动魄，含有深刻的哲理。我不管读了多少遍，仍然会有时拍案叫绝，有时掩卷沉思，有时潸然泪下，有时仰天大笑。其中有些故事情节非常精彩，让我刻骨铭心，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鸿文利用产假休息时间，也看了《基督山恩仇记》。她生下女儿才半年，就奉调去四川绵阳建设三线清华分校。

我还把这部小说借给她的同班同学林维南看过（林维南59年毕业以后曾给梁思成先生当过助手，后来调到北京日报当记者，我们当时常常见面）。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首先是学校这边乱了，接着绵阳那边也乱了。有一天，我带着两岁的女儿和林维南一起在日坛公园散步，他问我学校的情况，并问我怕不怕？

我说：“怕也躲不开。”

林维南说：“你能挺住，我觉得你挺像《基督山恩仇记》里的基督山伯爵。”我并没有否认。

那天，我刚好收到鸿文寄来的信。她虽人在绵阳分校，也挨了大字报轰击，但她更担心我。我回信说：“你放心吧，我能挺住，林维南说我像基督山伯爵，我也觉得有点像，黑夜过了，天总是要亮的。”

谁知，我这封信被在绵阳分校的学生查获，抄贴出来，而且还寄回学校，抄贴在工字厅前的大字报栏上。质问我报什么恩，复什么仇。说是地地道道的“变天账”。搞得我很狼狈。好在没多久就被新的大字报覆盖了。

在1.30被绑架以后，我常常想起这部小说，我会联想到其中的许多情节。有时我会和小说中的人物对话，我会问爱德蒙·邓蒂斯：“我现在该怎么办？”我也问过法利亚长老：“我这样做对吗？”开始，还只是模模糊糊的想法，后来慢慢清晰了，具体了。渐渐地我知道，我常常想从《基督山恩仇记》里挖掘的是什么？是“越狱”，是“逃跑”！

当我在化学馆一楼被命令掀起走廊暖气沟的大方砖时，立刻就想起这条沟通到化学馆和音乐室之间的旱井，这是一条很好的逃跑路线。但当时因井里的屎尿太多了，没有选择那条线路。

后来，我被关到三堡疗养所西翼二楼朝北的房间时，一眼就看见房间中间系着一条粗的铜芯电线，可能是用来晾衣服的。但是送我进此房的人并没有注意。他一走，我马上将这条电线摘下来，卷好藏在床板下面。因为，法利亚长老挖地道用的铁工具，都是从他睡觉的床上拆下来的铁件改造成的。这条粗的铜芯电线，说不定将来也能派上用场呢。

他们每天晚上审讯我以后，吃过晚饭就在我的囚室正下方的一楼房间打麻将，有时很热闹，甚至是吵闹。每天夜里差不多12点时，有一列火车喘着气爬坡上来，整个山谷天崩地裂地震动二十分钟，我想这是我逃跑的最佳时机。法利亚长老也是这样来选择时机的。

很多偶然的因素碰撞在一起，就会出现一些奇迹，似乎冥冥之中一切都有所安排。

有一天，冯家驊主审。除了随意耍了一会拳脚以外，他皮笑肉不笑地说：“给你透露两个好消息，一个是李康来了。你不是不承认吗？那我可要你们当场对质，你们互相咬，互相打吧！第二，我们从学校搬了录音机来，给你们录下音，在全校一广播———嘿嘿———。”

听了“老四”这一说，我的确有些紧张。我不怕录音机，因为有没有录音机也是一样的。我担心的是要我和自己的同事、老师和同学对质，甚至如66年8月在科学馆那样，逼迫林泰和何介人对打———我不能揭发，更不能动手打自己的同事，我要提前实现我的逃跑计划。

然而，坏消息里面也有好消息，那就是从冯家驊口音判断，饶慰慈和文学宓现在不在他们手上。

法利亚长老在死牢里会认真研究狱卒们的活动规律，我也研究我的“监护人”或“保镖们”。我发现他们每天七、八点钟起床，在我的窗下大便，所以我窗下大约有十几、二十摊大便，在上面看得很清楚。要是黑夜里在一堆大便上跳下去，我真有些不情愿。

但是，时不我待了。我不知道准确的日期。但是按月亮圆缺望朔，可以估计日期已经到了阴历二月底，正是没有月亮的时候。月圆天空皎洁时运输马队结队而行，逃跑是不安全的。如果没有月光，听到有追兵的声音，还可以躲藏一阵。

还有一些没有解决的问题，也都在一些偶然的互相碰撞以后，意外地得到了解决。

3月25日早晨，他们叫我：“出来，提上你的水桶。”我提上水桶跟着他们从西翼的西门出去。“放下水桶，这里有把铁锹，去把北墙下清理一下。”这正合我意，首先我把那些大便清理了，挖了个坑埋起来。

同时，我发现我窗下的土地是松软的没有散水，二楼窗下还有一条线脚，距室外地面大约有2.8米，从二楼窗口出来可以蹬踩。我曾从2.5的高度跳下过，估计跳下2.8米也不成问题，何况下面是松软土质呢！

清理完了，放回铁锹。一个人说：“上前面小水沟洗一洗吧。”我没吱声，这已经有

过两三次了，我就提起水桶向大门口的石桥走去，而他们大约有六七个人离我有十几步远跟着我。

大门口的石桥和疗养所主楼前广场有不到2米的高差，用十几步石台阶相连。

机会来了，这种机会是常常可遇而不可求的。我下了几步台阶，我的“保镖们”落后我十几步远。正好有个空档，他们看不见我，或者不能看见我的全部。这时，从下面走上来一个邮差，和我面对面近距离打个照面，但是我后面的“保镖”却刚好看不见。我在和邮差擦肩而过的时候，大胆地问了声：“师傅，这里到南口有多远？”他答：“三、四十里吧！”我赶紧说了声：“谢谢！”我没有回头看我的保镖，我已经得到我想得到的答案。也就是说，如果我从午夜12点钟开始走，三、四十里走四个小时，无论如何都可以走出南口。我会成功的！

于是，我的逃跑计划已臻以完善了。我兴奋不已，开始做最后的准备。

最后，难得的机遇，又助了我一臂之力。

3月27日上午，还是冯家驊主审。除了例行公事的打骂以外，他到中午快结束的时候说：“你还是不肯交待吗？没关系，我们总有办法撬开你的嘴。我不会打死你的，我们要的是活口。你们不是有‘攻守同盟’吗？那时，有人被动，有人主动，那是你们自己可以选择的。我给你24小时的思考时间，这24小时我们不干扰你。24小时后，明天下午，你再不交代我们就不客气了。”

我不担心什么攻守同盟，我在想这个“老四”所说的时间安排，刚好和我的逃跑计划相吻合。

中午，他们把一天的干粮送到我房间：两个窝头、一块咸菜，一暖壶冷水。这是我一天的标准口粮。[注09]这人放下就走了，临走还说了句：“明天见！”

下午，我把整个计划又在心中排练了一次，并默默地问法利亚长老：“我这个计划有问题吗？能成功吗？”我听不见长老的回答，但是眼前出现一片云雾，云雾后面有一片密林的山沟。我明白，这是三堡西翼北面的山沟。那条山沟我知道，这是长老明示我就走那

条向下通向车站的山沟。

1965年暑假我们带学生军训后在“三堡”写总结报告时，向武装部借了一支小口径手枪，就曾在那条山沟练习打枪。

我知道只有从左侧一条土坡走下去，才能最安全最短距离走出这条山沟，走到公路和铁路上。但是这条路线还是有几处地形不是很清楚，似乎还有陷阱，这时已无法搞清楚了，只能选择这条路线了。

白天，我从窗口向外搜寻，发现灌木丛中有一段树枝，长约1.2米左右，粗约2公分，到时可以拣来防身或当拐杖用。

我打开窗向下看，一切都满意。不过，我原计划是将我收藏的电线绑在暖气管上再打上几个结子，从窗口慢慢滑下去。这样做，被发现的可能性大。首先是距离窗口太近，容易弄出声音，或可能从室内看到。还有，这条电线只能留在窗外，早晨他们起床外出大便秘时，就会看见这条电线，这样我就少了几个小时的时间。所以，我决定修改计划。

晚上十点钟了，我将房内有些文件、草稿纸之类的东西销毁，尽量少留可以成为“罪证”的东西，又将棉大衣塞到被里，弄成像是一个人睡在床上的样子。

我心想，爱德蒙·邓蒂斯是调换了法利亚长老的尸体，自己钻到装尸体的袋里，而将法利亚长老的尸体放在自己的床上，骗过了狱卒，使他们对长老实行“海葬”时，从悬崖上抛下装尸体的布袋，爱德蒙·邓蒂斯乘机逃了出来。我现在没有他那么复杂，但是，我这是真的，他那是小说！

夜晚十二点，窗外天空漆黑，没有一点光亮。近处，我的囚室楼下，人声嘈杂，我的“保镖们”早已开台赌上了。远处渐渐由小到大，火车吐气挣扎费力爬坡的声音越来越近了。我下定决心，把电线盘在身上，把没吃完的口粮包好扔在窗外地上，小心地翻出窗外，双脚踩在外窗下的线脚上，小心地关好窗子。转身看看，一切都满意，自己对自己笑了笑，默默地感谢基督山伯爵和法利亚长老！当火车声最大时，我跳了下去。

我完成了逃跑计划的第一步，但是跳下着地时，右脚腕扭伤了！我必须忍着痛走到南

口。

午夜逃亡，与狼同行

在《基督山恩仇记》里，当法利亚长老和爱德蒙·邓蒂斯越狱计划正准备实施时，法利亚长老却第三次发病突然身亡了。爱德蒙·邓蒂斯虽然很悲痛，却突发奇想——狱卒抬起装着邓蒂斯的布袋走到监狱外的悬崖边，将布袋荡了几下，就扔下了悬崖。“终于，随着一个可怕的冲击，他掉进了冰冷的海水里。当他落水的时候，发出一声尖锐的喊叫，那声喊叫立刻被淹没在浪花里。”

我很喜欢这段描写，但我不希望这事发生在我自己身上。我已下决心逃跑，像邓蒂斯一样，“不让自己有片刻时间来考虑这个决定，真的，要是他仔细想一想，他这种决心或许会动摇的。”

火车在山谷中轰鸣。我赶快向右滚到黑暗中，看看“麻将友”们打得正欢。我在黑暗中躲了半分钟，活动活动那受伤的脚腕，发现还能动。虽然很痛，但还有感觉。我爬起来，捡起吃剩的窝头和那根树枝，忍着脚腕的疼痛，踉踉跄跄地从左边一个小山沟滑下去。临下滑的时候，我回头最后看了看二楼黑暗的囚室和一楼打麻将的灯火辉煌处。

我对这个山沟并不陌生，1964年和1965年我在这里练习打小口径手枪。现在天色黑暗，没有月光，居然还有些光亮，伸手可见五指。我这时才明白什么叫“星光”。如果连“星光”也没有，可能要恐怖得多了。借着星光，我看到早春的残雪。我摸索着慢慢走到疗养所北边的另一条小沟，顺着这条沟就可以到三堡火车站。

五年以后（即1973年），我们从江西鲤鱼洲农场撤回北京，分批到三堡疗养所疗养的时候，我又到这条山沟踏勘了一下。我看到当年逃出三堡所走过的路，实际上是一条极为危险的小山沟，宽不到30公分，左边是一个70-80公分高的坎，右边是山中积雪和已经融化的湿地，我居然平安走过，没有掉到坎下或踩到积雪融化了的湿地里！

突然，“呜——”一声拉长了的凄厉的声音从右边的山林深处发出。

我明白这是狼嚎！同时，远处传来许多不知是山谷回声，还是远处狼群的回应声。以前在疗养所时也常常在夜里听见过，不过没有这么近，这么恐怖。本来狼嚎已很恐怖和阴森，而远处的回声或回应，听起来就更加恐怖和阴森。然而现在顾不上这么多了。怕也没有用，也没处躲了。

我立刻把缠绕在身上的粗铜芯电线解下来，摸黑弯成一个约 60 公分的圆圈。听说狼怕圆圈。五十年代，我和同学们到八达岭玩，看见山上的房子和围墙上常常画了许多圆圈，据说就是用来防狼的。另外，听说狼多疑，你越害怕，它就越凶恶。所以我左手执圈，右手拄着粗树枝，一瘸一拐地向北山沟走下去。

走到三堡火车站时，火车已走远了。车站灯火通明，不见人影，安静得可怕。我在一个电灯杆下坐了一会，看了看脚腕，有些肿，吃力时还很痛，但可以动，我知道没有伤到骨头。我下决心继续走，走出南口。我没有选择，只能向前走。我起身，作了几下深呼吸，又艰难地上路了。

我只能沿着公路走，没有路灯，偶尔有几间房子门口有电灯，能照亮前后几十米远，然后又是一片漆黑，只有星光伴我孤零零的一个人走着。

山谷里潺潺水声虽然很有诗意，但是另外还有一些奇怪的我分辨不出哪里来的声音，还有就是狼嚎声。有时狼的嚎叫好像近在咫尺。我马上环顾四周，能看见暗红的或暗绿的、恐怖的、阴森的眼光。走到有些光亮的地方时，这些阴森的眼光就不见了。再走到黑暗的地方，又出现了。如果没有出现，就一定会有一声长长的狼嚎，接着远近又有呼应。有时，我虽然看不见他们的身影，但阴森的眼光告诉我，它们离我很近了。我知道，遇到狼或野狗，都不能逃跑。跑，你就完了，何况我的脚受伤了，还真跑不动呢！所以它们离我很近的时候，我就把弯成的铜线圈和那根粗树枝前后舞动，又在路边借着星光找到几块稍大一点的石头放在路中间。狼多疑，不知我搞什么诡计，不敢轻易上前。有时走累了，我就走在悬崖边的石墩上休息，北对悬崖，我想狼群不可能从背后袭击我。

大约四点钟，转过一个小山口，突然，前面山里出现一些亮光，同时还传来一些山谷

中不应该出现的声音。渐渐地，亮光和声音都大了，我认出来，这是南口采石场的灯光和采石机械的声音。到南口了！我兴奋极了，甚至一时忘了受伤脚腕的疼痛。当我想起跟了我一夜的狼群时，才发现它们都不见了。我面对茫茫的大山、星空和长夜，心里默默感谢这些没有找我麻烦、并陪送我一夜的狼群。

五年以后，当我再次到三堡休养时，也曾一个人夜访山沟、野林和公路，希望能碰到那些狼群，至少能再听到那凄厉、可怕的狼嚎。可是什么都没有，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可遇而不可求”吧！

这时，公路分了岔。直走，可能到南口火车站。左拐则可达昌平的一个跨过铁路的道口。守着道口有座小房子，小房子里外都有电灯，所以这个道口很光亮。我刚想找块石头坐下休息，忽然，小房子门开了，有一位铁路工人咳嗽着出来，向路边泼了一盆水。

我乘势向前问道：“师傅，经南口的火车有几趟？”

“两上两下。”师傅说：“北上去张家口方向的下午一趟，夜里一趟。南下北京城的上午一趟，下午一趟。”老师傅说着，又看了看我，说：您怎么一个人走夜路啊！黑里吧唧的，够胆子！”

“谢谢您啦！”我不敢多说。

我心里算计着，现在唯有经昌平去北京一条路最安全。我估计，如果现在休息的话，伤脚就可能再也走不动了。

我又迈开那受伤脚，向昌平前进。我觉得最坏的可能已经过去了。这就是如果半夜大约两点左右，他们巡查时，发现我的被窝里不是我，而是棉衣；或者他们早晨打完牌，准备睡觉时巡查一下，发现被窝里不是我，发现这两种情况，他们会开出那部吉普车展开追捕。但当他们追到昌平时，我已到北京了。我藏在北京这么个大城市里，他们要抓我可不是很容易的事呢！于是我坚决地走下去！

走着，走着，天渐渐亮了，周围人和车的声音渐渐多起来了，还有些部队战士早晨出操了，“提高警惕，保卫祖国！一、二、三、四——”

又累、又困、又饿的我，虽然咬紧牙关，硬挺着走下去，但也渐渐支持不住了。我想，如果我真的走不动了，在南口，我可以去找 XXX 部队；在昌平，我可以找昌平工程兵技术学校，他们一定会帮助我的。

渐渐地，我出现了幻觉：

有很多影像出现，我仿佛觉得自己也在解放军的晨操队伍里，喊着口号-----

这时，我仿佛看见那辆吉普车，看见开车的是冯家驷-----

我仿佛看见昌平公路上转向“200 号”和南口方向的路口，从那里往南一点就是昌平到北京德胜门的公交车站，我到了-----

我失去了知觉-----

最危险的地方，也许是最安全的

当我恢复知觉，睁开眼睛时，看见几位解放军正在看我上衣口袋里的东西。

“清华的工作证，清华的。”一位解放军说。

“醒了，醒了！”另一位说。

“喂，同志，你是不是要回清华去？我们通知清华来接你，我们是工程兵技术学校的。”我摇头。

“我们送你上公共汽车？”

我点点头。

他们扶我起来，护送我慢慢走向汽车站。站台上正好有一辆空车待发，他们小心地扶我上车，安排我坐在司机后面第二排的位子上。

他们又问：“你认不认得路，身上有钱吗？”

我又点了点头。

“走好，我们回去了。”他们说完，又跟售票员说了几句什么。

过一会，车开了，我趴在前面座椅的靠背上，昏昏沉沉地睡着了。

“同志，同志，醒一醒，你是上北京还是上清华？清河到了，上清华在这里转，上北京就到德胜门？”

我好像好久没有说话了，现在低声说：“德胜门！”

“您有钱买票吗？没钱不要紧——”售票员说。

我递给售票员一张5元的钞票，她给了我一张票和找回的一些钱。我也没注意看，就放回口袋。接着又趴在座椅靠背上，但没再昏睡，并逐渐清醒了。很快，车就到德胜门站了。

售票员对我说：“您走好，要不要我们帮您？”

我摇头，并说了声：“谢谢！”

下车一看，是德胜门外大街的南端。我慢慢走到护城河边，有一条石头台阶从河岸可以下到水边。护城河水虽然不是“清澈见底”，但至少不是浑浊的。

水面上映出了我的面孔：苍白、清瘦、眼睛无神，须发很长，鼻孔处还有些血痂——很像个逃犯。我手捧护城河水洗了洗脸。

看了看周围，没什么人。我就在台阶上坐下来休息，同时，计划下一步棋该如何走。

首先，我应该决定先和谁联系？是先和家里联系，还是先和学校联系？我想，和学校联系太危险，因为学校所有机构目前都被团派控制，我没办法直接找到我最信任并与我关系最密切的几个人。我逃跑以后，学校会乱一阵，老团会发疯一样追捕，而老四也会乱一阵。老四不乱，那肯定知道我已经安全了。老团就会拼命从老四内部探听有关我的信息。这种局面对我是很危险的。

然而，无论如何，我的目标还是要回到学校。虽然回学校相当危险，但往往最危险的地方也许是最安全的。比如我深夜独自从坏人、野狼出没的山沟里走出来，非常危险，但事实也证明这是最安全的逃跑路线。

所以我决定先和家里联系。怎样联系？我脑子里已大致形成了一个计划。

我以前常常从学校骑车回我父母家，或从父母家回清华。都经过这里，对这里很熟悉。1964年带学生到部队军训时，我记住了解放军团长的教导，走过什么地方，都要记得这地方有什么特点。现在派上用场了，我现在要用公用电话站-----

这时，时间已是早晨8点多了。我起身，慢慢走到德胜门内大约是鼓楼西街路北的一间小商铺前，我记得这里有个公用电话站。

我走上台阶，掀起厚厚的门帘，走进去。里面两个人，一个女的背着门蹲在地上在整理什么东西，另一个男的坐着，和我打了个招呼。

我平时都讲标准的普通话，现在我却用广东口音的普通话说：“师傅，可不可以用一下电话。”

那人说：“可以，本市一毛钱一次。”

我拨通了我父母家的传呼电话，我还必须用广东口音，因为那边的管理传呼电话站的正是查抄和占用我家房子的“街道积极分子”。

我用浓重的广东口音说：“我找铃铛胡同15号院内李曼云（我母亲）家听电话，我姓刘。”

那边接电话的人说：“请稍等一下。”

也就两三分钟时间，但我感觉很长、很长。“喂，哪一位？”那边传来的是我父亲很重的广东口音。

我立即用广东话说：“爹爹，是我，阿启，请你一定讲广东话，不要讲普通话。”

“他们放你回来了？”父亲问。

“不是，我逃出来的。请你告诉妈妈，请他放心。我现在去梓哥家（梓哥是我大姐夫何梓华，我大姐一直下放在昌平，经常不在家）。你知不知道鸿文怎么样？”

“她昨天好像进城正在梓哥家，你大姐周末回来了，昨晚才回昌平。”

“孩子好吗？”我问。

“很好，放心啦。我叫你妈给你弄点吃的送去梓哥家。”父亲说。

“不要，今天中午以后，你们都不安全，他们会下令搜捕我。你们和孩子都要特别注意。如果送吃的东西给我，也不要到梓哥家里。今天中午12点以前送到日坛公园儿童游乐场去。”

打完电话，我准备去饶慰慈家。她家在一个深宅大院的最后一层院落，里面不知住了多少人家。我进了大门，从右侧直巷走进去。我走了一半，连一个人影都不见，感觉不妙，立即停步。我想这样到她家，或被人看见，会不会给她带来麻烦？还是马上回头吧！今天回想起来，我还后悔当时应该到她家，告诉她立即躲藏起来。也许她就可以逃过这一劫。

从大宅院出来，我搭公共汽车，经过三个站到张自忠路人民大学教工住宅区。

我艰难地走上我姐家所在的五楼。敲了门，是姐夫和他的一位同事开的门。姐夫一见我，吃了一惊，赶快叫我进去。我看见他家三房中最大的一间房里面坐满了人，好像在开会，他们也都看见我了。

我心里暗想：“糟糕！”

姐夫看出我的心思，就说：“没关系，都是自己人。”

但同时，他又提高嗓门，似乎有意让屋里的人都听到，大声说：“这里不安全，快走。”

这时，我看见鸿文走出来了。两个月没见了，我看她面容憔悴，目光呆滞，我很内疚，是我害了他，但现在顾不上这些了。

姐夫拿出两把自行车钥匙说：“快走。”

然后似乎是不想让同事们听到，压低话音用广东话（他是广东南海人，和鸿文是同乡）说：晚上七点以前你们在什么地方？”

我小声说：“在日坛公园附近。”

他说：“好，晚上七点在建国门向西行的马路上见面。”

我们很快下楼，骑着自行车离开人大宿舍。这时我才注意到院里贴满了大字报，许多人在看大字报，因此也没有人注意我们。

出了张自忠路一号（原来是铁狮子胡同一号）大门，鸿文问我：“怎么走？上哪儿”

我说上日坛公园方向。这时已经 11 点了，我告诉鸿文，母亲可能在 12 点以前到日坛公园来看我。

她批评我：“不应该让老人家冒这个险。”

这时，我才感觉自己很饿。一想到两个月来都是一天四个窝头一块咸菜，而且走了一夜，只吃过一点点干粮。这样一想，我更觉得饿得不得了。我叫鸿文去旁边小食店买点油饼或肉肠之类的熟食。她立即去买了，我也顾不上是否体面，就在大街上吃起来。吃完了，我们就骑车向日坛公园东门而去。

快到东门的时候，我忽然见到清华建四（64 年建筑系毕业的学生）的陈书栋骑车迎面而来。我们两人对视了一秒钟，他似乎没有感觉。我则肯定不会认错人，是陈书栋无疑。我们向相反方向走过之后，我回头看他，他没有回头，说明他没有认出我。我曾想过：如果他认出我怎么办？我想我会如实的告诉他我如何被绑架，如何逃出来，蒯大富们正在追捕等等。我相信他听了会帮助我的。

他是清华建四的工农调干生，年级党支部书记，我教过他们，和他很熟。建四还有十几位工农调干学生，都非常朴实，虽然因基础不太好，学习成绩较差，但他们非常努力。他们差不多都比我大，但对我很尊敬。

66 年文革开始时，大字报铺天盖地，我们都被打成黑帮，游街戴高帽，每天定时要去看揭批大字报。有一天，我正在工字厅门口看大字报，忽然一个熟悉的身影，我认得是建四的调干生李春生。他见我剃了光头，一副落魄的样子，就笑着说：“罗先生，我是李春生，记得吗？”我苦笑，他说：“没事的，很快过去的。我在东北工作，现在是带领单位造反派来学习经验的。”还有一次是 69 年，按照林彪一号战令，我们大批教师干部奉命必须全家到江西鲤鱼洲农场劳动并落户。鸿文已先一批去了江西，而我正在收拾行装。有一个很少钱的银行存折也被查封了，身上一文不名，连饭堂的饭票都买不起，真是穷困交加。这时，我忽然接到两张 20 元的邮局汇款单，其中一张我认不出是谁寄来的。另一张汇款单的简短留言上写着：“罗先生，感谢你在我最困难的时候资助了我——王。”虽然没有写

全名，只有一个“王”字，但就这样一个王字，我已经想起是一位工农调干生王福勤。

到了日坛公园的儿童娱乐场，鸿文注意到离东门不远的地方有一座较大的建筑物，是肿瘤医院，她说去看看，必要的时候可以混到复诊病人当中，可以躲避追捕。她很快就回来了，她说这个地方必要时可以用。但是我们后来并没有用这个“避难所”。

母亲来了，带了一饭盒炒饭，我狼吞虎咽地吃个精光。我们嘱咐母亲要小心保护自己和孙女，母亲含着眼泪离开公园回家去了。

差不多整整一个下午，我们在公园里，躲在灌木丛中一小块能照到太阳的空地上休息，我脱了鞋晒太阳。

鸿文欲哭无泪，她感叹说：“怎么办，以后的日子怎么过？”

我说：“如果市政府或专政机关也说我是反革命，也要抓我，那我就真要反革命了！”

鸿文困惑地看着我说：“我不懂你的意思。”

我也没再说什么，我怕她害怕，不敢再说了。

天慢慢暗了下来，公园里已空无一人，这里太静反而不安全。下午六点多的时候，我们商量了一阵，决定先去看看林维南。他住北京日报宿舍，就在日坛公园附近。

我们到他家，停靠好自行车，爬上四楼，敲了几下门，林维南开了门。跟以往不同的是，他家走廊里的几个房门都是关着的，似乎有什么事。他见我们马上说：“小杨（他的妻子）刚生了个女儿，住了几天医院，今天才回家。你们别进去了，我妈妈为躲避印尼反华也刚回到北京-----”

我把我的情况简单说了一下，他叫我们到里面一个小房间，给我拿了一小瓶广东人喜欢用的跌打伤湿油，鸿文立即帮我涂抹并按摩了一阵。林维南又给了我一些粮票和钱，就催促我们赶紧离开，也没问我们到什么地方去。我们都心知肚明，情势是非常危险的，到什么地方去最好不说，也不问。

林维南送我们出门。但和平时不一样，没有送我们下楼。我们慢慢走下楼。走到一楼单元门口，我开自行车锁时，不经意的看了右边单元的厨房一眼，发现一位男士正在注视

着我，我心中有些不安，

因北京日报很多人认识我。不只因为林维南，而且因为我负责宣传工作，和北京的几个报社都常有来往，认识不少人。几天以后发生的事情证实了我的担心。

七点钟，我们准时骑自行车到建国门大街，从建国门向天安门方向骑去。

不一会，姐夫不知从什么地方赶上来了。他说：“我找到了郁正汶，他答应我们先到他妻子的弟弟的家。他们两口子都姓李，都在五道口商场的餐厅工作，人挺好，我们到他们家再商量怎么办。反正你们总不能在街头游荡。你们从这里向西走，在火车站口的方巾巷向北直走。到朝阳门大街往东拐，出朝阳门再直走到三里河口右手边，在那里会面。郁正汶带你去她爱人的弟弟的家。现在我和你们分开走。”

我们七点二十分到三里河街口，黑暗中似乎有好几个人影。我先看见姐夫，然后看见郁正汶。他是中国青年报的体育记者，是我大姐、姐夫的燕京新闻系的同学。

院系调整后，燕京撤销，他们“改嫁”人大。从燕京时起，他们就长在我们家聚会、碰头，似乎他们几位男生曾被打成“反动小集团”，后已平反。他在报社两派中很活跃，但他是天派的。不过，这在文革中是个很普遍的现象。正因为他是天派的，与414是对立的，对我而言更安全一些。

我刚和郁正汶打招呼，问声好。

旁边闪出一个人，一把搂住我哭了。我吃一惊，这才认出是大姐征敬。她很激动，断断续续地说：“受苦啦，挨打了没有？我昨天才回昌平，心里总不是很平静，似乎有什么事，整晚睡不着。今天一早晨我就决定赶回北京，一进门，阿梓（姐夫）就告诉我说你逃出来了。你看，我到现在心还在乱跳。”

姐夫厉声下令道：“别婆婆妈妈的，快点！马上随郁正汶走！下一步如何再商量。”

然后对大姐说：“你回家吧，这里人多了反而不安全，引人注目。”大姐很不情愿地离开了。

我们一群人则随郁正汶骑车进了三里河小区，左拐右拐转到了小李家。他们很热情地

接待了我们。

当晚，鸿文帮我从头到脚擦洗了一遍，并在受伤处上了药。

这时已过午夜十二点，正是我昨晚跳下楼的时间。现在回想起来，有点后怕，如果麻将友当中有一位外出小便，正在这时撞上我跳下来；如果麻将友当中有人听到一个重物坠地的声音，同时还听见有人喊了一声；如果———。

“喂！”姐夫唤醒了我。“现在要有个打算。现在这里虽然安全，但你总不能永远躲在这里！”

我说：“我正在想，我应该回学校去。”几个人一起摇头反对。

我说：“最危险的地方也许正是最安全的。”大家不说话。

姐夫说：“这样，明天我们出去看看形势，看看情况再说。”

郁正汶说：“我明天到清华去探听一下，最好能跟你们414的人接上头，听听他们的想法和意见。如果他们也认为你回清华去最安全，那就听他们的安排了，但你得给我一个最安全可靠的接头人。”

我告诉他的接头人是李兆汉。[注10]

他随口问我：“可靠？”

我说：“100%。”

姐夫问：“你为什么不找印甫盛和万润南呢？”

我回答：“不是不想找。但是将近两年来，学生宿舍变化很大，我没有把握能安全的找到他们。而且‘老团’一定很注意他们，因为他们和我关系很密切。”

讨论完了，我们已困得不行了。

临睡前，我还没有忘记问一问法利亚长老：“我这样做行吗？”

我没听到回答，就已进入梦乡。两个月来，我第一次安稳、平静地睡了一夜。

总部指挥救援，回到学校

次日（3月29日），我们以急切的心情等着郁正汶，他去清华探听消息了。

天色渐暗，夜幕降临了，我们都有些焦虑不安了。一直等到午夜才听到楼下有搬自行车的声音，郁正汶回来了。这时已是3月30日凌晨了。

郁正汶侃侃而谈，仔细描述了他去清华探回的以下信息：

“我到了清华，学校里还算平静。大字报栏里的内容并没有关于征启的事，看样子谁都摸不清真相，不愿先发制人。

晚饭以后，我去十七宿舍找李兆汉，他不在。他的夫人廉慧贞老师警惕性很高，盘问再三。我开始没有说谁叫我来的，她也躲躲闪闪。

最后，我说是罗征启叫我来的，我是他姐姐罗政敬和姐夫何梓华的老同学，罗征启逃出来了，他说除了李兆汉，别人都不能说！

廉老师说：“李兆汉在主楼后厅开414的形势讨论会，我带你去。”

我们一起骑车到主楼，他很快在后厅找到李兆汉，李立即在后厅的大柱子后面和我见面，我只简短地说了几句。

他说：“行了，等一会儿一起说吧，，我去通报一下，你稍等。”

我不放心，又叮嘱说：“这事绝对不能泄露出去，要绝对保密。”

他笑了笑：“你放心吧，等一会你见到这些头头就知道了。”

我当时还不明白，后来我参加了414高层会议“讨论救援罗征启的事宜”，我才知道我的顾虑是多余的。

主楼后厅的会开完了，也许是因为我有事，所以觉得会是提前收场的。

换了一个小房间开会，只七八个人，为了保密，即便总部委员，也不一定都参加。414的第一把手沈如槐主持这个会，先请我介绍一下情况。我只说了大概情况，连罗征启现在

藏在什么地方也没有说，他们也没有问。

沈如槐说：“现在情况很清楚了，我们下一步应该怎样做，罗征启自己有什么意见？”

我说：“罗征启的意见倾向于回到学校，他觉得老团一定认为他不敢回学校。最危险的地方也许是最安全的。现在所有的车站、关口，一定有人监控的，可能外逃比回学校更危险。

讨论进行得很平静，很理性。大家比较倾向接罗征启回学校。于是沈如槐拍板，成立“救援小组”，由宿长忠指挥。

沈如槐、宿长忠和其他414头头真的都堪称将才，指挥作战，沉着又灵活。沈如槐拍板以后就叫无关的人退席，我知道这事越少人知道越好，但是这事也不是三五个人能干的。这时我才发现，小房间门外已经有几个人在等待宿长忠的命令。

沈如槐、宿长忠分派任务有序而且果断，从派汽车、司机是谁、车长是谁，接头地点、回学校的行车路线、进校以后的路线、校内外几个关键路口各派414战士若干守候，等汽车过了再散，到要求从下午起，守卫科学馆的人全部换成和罗征启比较熟悉的人，并且有“223战团”印甫盛负责-----宿长忠一口气说完，简直滴水不漏。又指定了和我联系的人，以及指示如果情况有变化，如何联系。大家还对了表，规定行动时间是3月30日下午两点半，接征启的地点是朝外大街邮局。十点半左右先去邮局周围看看，如果有变动，会及时通知我们。

然后叫我先走，他们还在商量什么。我离开时已是3月30日的一点多。

听完郁正汶有声有色的介绍，已快深夜三点了，我们都松了一口气，安心休息，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营救回校行动。

上午，郁正汶来了。他说：“从我们住的地方到朝阳门外大街邮局骑车来回几次，测得平均时间是9分钟。但是，当他十点半钟去邮局联系的时候，414总部派人来说，情况有变，这个地点不能用，因为邮局里有三个“老团”，不知为什么，就是不走。虽然看样

子不是为了我们，但总部为保险起见，还是决定修改计划。时间不变，地点改在邮局后面，有一个饭馆，门口是三条路，丁字型的交叉口，有情况时比较机动。总部说，汽车早晨已经出动，在市里转，同时注意有没有跟踪的尾巴。我看他们部署的还是很严密的。”

郁正汶说完，又去测新的联系地点到我们住的地方的距离和需要的时间。他昨夜没睡好，又跑来跑去，很辛苦，但看来他很兴奋。新的接头地点离住地的距离稍近了一点，需要五分半钟，这是他午饭前多次实测的结果。

我们一起吃过午饭，时间越来越近了。两点二十分，我们和主人告别，我也和鸿文话别，慢慢走下楼。虽然过了两天，我受伤的脚腕，吃力的时候还是很痛的，因为脚痛，不能跳上自行车后座，只能先坐好，请郁正汶从前面跨上车，我的脸顶住他的后背。

只听他说：“还有四分半，三分半，两分半，一分半，一分钟，前面已经看到接头地点了，还有30秒，20秒，快到了——”

这时从后面那条小街里冲出一辆吉普车，“嘎”的一声在我们的前面急刹车，这情形和两个月前“老团”抓我的情况几乎完全一样，我都来不及想、来不及惊慌、害怕，从车上跳下来几个人，一个大个子[注11]把我从自行车上拦腰抱起，轻轻放进吉普车后座，车里几个同学轮番拥抱了我，同时，车子几乎没停就加速开走了。司机我认识，是汽车实验室的张德禄，他扭过头来对我亲切地笑了笑说：“受苦了。”

这时我才想起郁正汶，却早已看不见了。事后他说，当他听到急刹车的声音，也吓懵了，后来看到上车以后互相拥抱，才放下心来。

坐在司机旁的同学是这次救援行动的现场指挥，名字叫尹尊声。他没怎么理我，眼睛一直警惕地注视着道路周围的情况，不停地问“有没有异常？”

坐在我旁边和后面的几个同学都报告说：“没有异常。”

尹尊声和这几个同学一直不讲话，很紧张地注视着左右和后边道路上的情况。每到重要的路口，都会报告是否有异常情况。

吉普车在北京市区转了半天没有发现什么异常。张师傅就说：“好！那咱们就上三环

奔学校东门了。”

过了林学院，快到学校东门外的铁路和去清河的公路交叉口，几个同学都说：“看见安全暗号了，可以进学校，大家准备。”

一位同学给了我一件工作服上衣，一个帽子，还有一个平光眼镜，并轻松地说：“没事，别紧张。”

车子开到东门，尹尊声说：“看见我们的人了，看见安全的信号了，别停，中速进校门。”

进门以后，车子径直钻过主楼左侧的过街楼洞口，向学生宿舍区开去。这条路要绕道稍远一些，而且经过学生活动区、宿舍区，两派学生都很多，一般人考虑不会选这条路的。

奇怪的是，已是下午4点左右，我居然看见不少同学在这个时间里，还在操场上锻炼身体，可惜马约翰先生已经去世，不然看到这个现象会很高兴的。

因为路上人多，车速还是慢下来了。车到大礼堂后面西侧的桥，开过去就是礼堂、闻亭、阶梯教室，科学馆后门。这时，张师傅发话了：“准备好，安全到达了！”

我只看见汽车对准科学馆后门前的小路，一位同学用一条大麻袋把我的头蒙起来。同时，张师傅一踩油门，汽车冲到后门前，嘎然刹住停下。还是那位大个子同学，把我扛进门。

只听得守门人问道：“抓了个什么人？”

大个子说：“老团三动的。”

守门人说：“好呀！”

我被扛着上楼梯，又走了一段，进了个房间。把我放下，扯下麻袋，我看见印甫盛、万润南、沙春元等几位同学微笑着看着我，我这才感到“回到家”了。[注12]

这个房间是三楼存放实验仪器设备的，大门上又有小门，是借还仪器设备用的，现在则给我专用。有人敲门，查对是总部头头特许的人，则打开小门，把大门的钥匙送出去，开了大门，再伸手出小门将大门锁上。

没多久，大家就注意到，这里住着一位神秘人物。“神秘”还在于此人“住”进去后，就没见出来。几个学生每日三餐轮流送饭，每晚总有一个学生陪宿。每晚，当科学馆夜深人静后，这个神秘人物才到男洗手间去方便及漱洗一下。

家破人亡，逃离北京

我到科学馆三楼的“密室”住下以后，陆续就有414里熟悉我的几个头头来慰问，看我。我听得最多的慰问语是：“不容易，好好休息。”

在科学馆的“密室”住下的第二天下午大约四、五点钟，走廊里传来吵架声，声音越来越大。我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应该是414总部委员蒋南峰），他大发脾气：“我说过多少次，我不赞成打人。两边互相抓打，迟早有一天出大问题，你们再这样，我不干了。”

有几个人略有争辩的说：“我们不能只挨打、受气，吃眼前亏。”[注13]

我听他们提我的名字，还说道“生死未明——等等”。

但蒋南峰还是非常坚决明确地反对打人，搞暴力，反对以牙还牙，以暴易暴。我想，如果当年掌了权的蒯大富能像蒋南峰这样坚决反对打人，清华的文化大革命，或许会少死一些人呢。[注14]

有好几位414的同学问我，在老团那边打人最凶的是什么人，我说了冯家驊等人的情况。立即就有人提议采取报复性措施，并主张马上动手。但是沈如槐、汲鹏、宿长忠等坚决反对，他们认为不可以这样。打人和被打的人都是好人，打人者中除了个别人外，大部分人都是为了信仰，只是方向错了，我们不能以错对错，不断升级，这是不对的。

沈如槐他们关心的另外一个问题，如宿长忠几次问我，有没有发觉或感觉414内部有什么问题？更直白一点就是有没有内奸？有什么应该注意的问题？

我说：“没有。老团虽然用刑逼供，但我觉得他们并不太了解414内部的情况。正因为不了解，所以才很急躁地采用刑讯逼供的办法。”

我还请 414 总部注意保护文学宓、饶慰慈的人身安全问题。我逃出三堡那天，本想去饶慰慈家告诉她最好躲藏一段时间，并请她通知文学宓，但我怕到她家去会引出更大的危险，所以没有去。

沈如槐等告诉我：“已经多次通知了文、饶等人，但他们似乎不太重视。”

我请他们注意，现在形势不断升级，不能不重视。然而，文学宓、饶慰慈等人还是不太重视，终于不幸先后落入团派手中。对此我颇感内疚。我跑掉了，他们却被捉到了。如果我不跑，他们是否可能避免被捉？

宿长忠还问我是否知道李康的情况。我说：传说他出卖了 414 总部和许多同志，这事我不能证实。我不了解总部的情况，李康比我更不了解。他能出卖什么呢？我从三堡出逃前两天，冯家驊说李康已到三堡，说他交了很多东西，还拿了几叠手写的材料，说是李康的交代材料，他们并没有给我看，只是远远地在我面前晃了一下。书写字体的风格像是李康的，但他们念了几段内容，我觉得根本就对不上号，用李康的材料来攻我和文学宓等，或用我的来攻李康，都是空对空，都正好说明他们并不了解情况，至少并不了解更为深入的情况。”

我向总部报告说：“冯家驊有一次问我‘张正权’在 414 起什么作用？我装作没听见，也没表态，因为我认为张正权（校刊新清华的主编）人很正派，基本上没参加两派的活动。他倾向 414 是清楚的，但他从未表露，也没有得罪过人。”

宿长忠、汲鹏都表示根本不认识此人。后来工宣队证实，冯家驊所指的是科研处的章正文，发音差不多，但不是同一个人。是他们搞错了，这也证明他们并不了解情况。

连续两三天 414 总部都派人向我通报了我家里的情况：鸿文可能藏在亲戚朋友家；大约 4 月 2 号老团抓了我父亲，之后又抓了北京日报的林维南。林的母亲因躲避印尼反华的浪潮，回到国内。她只会讲客家话，不会讲普通话，看见有人抓自己的儿子，就上前阻止，被踢倒在地（过不久就去世了）。[注 15]主要是追查我的去向，但都没有得到确实的信息。

听到这些消息，我非常不安，很难过和内疚，我自己逃出来了，安全了，但却连累了

家人、朋友。

难道我错了吗，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又向法利亚长老请教。长老说：“这就是人生，你跳楼逃出来太顺利了，所以要让你摔一下，痛一下，但是你还是没有全明白。要知道，人生总是顺、逆交替，苦、乐相随的，不可能事事都顺利！而你文革前的路走的很顺，几乎没有受到任何磨难，所以现在你要补上磨难这一课，还要为今后多积累一点。今天多受点苦，今后就可能少受点苦！”

4月5号上午，我听到两派的广播台所播内容有些不对劲，团派的广播，一个劲地骂罗政启。并一连串说了几个“死”字：死不悔改，死不认罪，死有余辜等等。而414的广播，则一再申明，要贯彻中央关于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指示，武斗伤人要依法处理。

听得我心惊肉跳，我感到一定出事了，因为父亲在他们手里。不会是父亲出事了吧，我心急如焚！

陪我住的几个学生吃过早饭都到“密室”来，他们都感到出事了，也估计最大的可能是我的父亲。他们一方面陪着我，另一方面派两个人去打探一下确切的消息。

十点半左右，打探消息的学生回来了。几乎同时，414广播台播出了414总部的声明：说老团于4月3日晚抓了罗征启的胞弟罗政敷，在回学校的路上，罗正敷因反抗遭殴打，并被用麻袋套住头，造成窒息身亡。[注16]对此，414严正声明这是犯罪行为，要求政府严肃法办杀人凶手——等等。

接着，汲鹏、宿长忠又来安慰我，我一直无言相对。

我的内心被痛苦、自责、压抑、愤怒——交替撕扯着，我说不出的话！我只能问法利亚长老：“这难道也算是‘磨练’吗？为什么不发生在我的身上，而要我的父亲、弟弟和朋友替我受罪？我真是后悔，我不该从三堡逃跑，我——”

我记得在《基督山恩仇记》里，但埃德蒙·邓蒂斯知道他的老父亲（老邓蒂斯）是因他被陷害入狱而无依无靠，活活饿死时，他非常伤心、悲痛。他当时的心情，我现在感同身受，完全可以理解了。

记得我上小学时，我的铜墨盒上镌刻着父亲亲手写的孟子的一句话：“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我1951年上清华时，父亲又给了我一个铜墨盒，上面镌刻着另一段孟子的话：“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如今，虽然我知道，这孝道之“始”和“终”，都有更深刻的内涵，但是我实在无颜面对先贤的这两句经典的话。我自己的发肤没有毁伤，却伤害了父母和兄弟，这算什么“孝之始”呢！更不用说“孝之终”了。

弟弟去世以后，据说中央有位领导发话了，说必须依法处理，杀人要偿命。于是团派总部委员孙耘等人就出面自首，承担责任，并且很快放了我父亲和林维南（我直到几个月以后才见到他们）。团派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广播台也不断叫骂，主要目标是“反革命分子罗征启”。接着又在4月15日左右抛出一个“罗文李饶反革命集团”，似乎这个集团能“定性”，孙耘等人就可以无罪释放了。

两派的矛盾，如果只是思想观点上的争论，那倒也罢了，而今提高到革命和反革命的高度，伤残致命，甚至殃及家属，我真无法想象将来何时、由谁、用什么办法来收场！

此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在我父母、亲友面前，尽可能回避这一话题，我不敢面对。

在《基督山恩仇记》中爱德蒙·邓蒂斯逃出死牢之后，找到了大笔财富，开始了报恩、复仇的计划。我对大仲马关于爱德蒙报恩的描写，非常感动。书中描写他的恩人，埃及王号船主摩莱尔因大风导致埃及王号沉没而破产，爱德蒙用他的财富复制了一条一模一样的埃及王号，并装满了货，开进马赛港，挽救了准备自杀的摩莱尔。马赛港的民众惊奇地看着驶进港的埃及王号，喊着：埃及王号！埃及王号！我每次看到这段描写都激动得流下眼泪。但是我对复仇的描写并不认同，我认为太过残酷，尤其是对待他新婚但被仇人弗南特霸占的妻子美茜蒂斯，以及她的儿子（亦即仇人的儿子）阿尔培，都太过分了。我想，仇是报了，然而，被复仇者的亲友、子女又要报仇——如此冤冤相报何时了？

过了几天，到4月15日，两派广播打仗又升级了。团派广播提出“打倒罗文李饶反革命集团”！并在前一天晚上捉了文学宓、刘承娴（建筑系教园林设计的教师，时任党委

统战部副部长)。当天,团派下通缉令命令饶慰慈到团派总部报到,而饶慰慈自认为没有问题,就到团派总部问询,当即被扣。[注 16]团派广播台马上广播说饶慰慈“畏罪自首”,并欢呼“胜利”! 414 派则受到极大压力,连续发表声明,要求停止非法绑架干部,并要求依法惩办伤害罗正敷的凶手,并交出罗征启。

当夜,我像前几天一样,在科学馆已经安静下来之后,才去三楼的男盥洗室洗漱,却意外碰到楼庆西(他是建筑系的教师,是刘承娴的丈夫),他看见我吃了一惊,问道:“传说你已经死了,你怎么样?” [注 17]

我说:“我逃出来了,但他们又把刘承娴抓去了,真是无法无天!”

他又问:“你看他们会不会打她,会吃苦吗?”

这个问题,我怎么回答呢?我们的对手当中,有些已经失去理性,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但是对家属,我怎能说得出口?只好说:“不会吧!他们打我可以,但是对刘承娴、饶慰慈两位女教师-----”

楼庆西摇摇头,没有再说什么。

然而,从此以后我们两人都没有再见到刘承娴老师,他们的两个女儿也从此失去了妈妈!

在所谓的“罗文李饶”这四个人之外,还有两个人,一个就是刘承娴,另一个是科学研究处的副处长徐一新。他受到通缉的时候,刚好不在学校,后来也受到追捕,最后 414 总部把他救到科学馆,直到 7 月 27 日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进校制止武斗时,才从科学馆被解救出来。

其实这六个人当中,我、文学宓和饶慰慈三人关系最密切,但是 67 年 4 月 23 日我在大礼堂 414 大会上发言时,代表的是六个人。所以,六个人都变成老团围捕的目标。

连续几天,两派广播台的高音喇叭,一直不停地借罗文李饶大做文章。随着广播互相攻击温度的快速提高,武斗的气氛也越来越浓,科学馆里“磨刀霍霍”,做“最坏的打算”。我没有出密室,但从听到的声音判断,科学馆里多了很多人。

大约4月20日，忽然有人敲密室的门，很急促。但是密室里只有我一个人，所以根据平时的约定，没有“暗号”不能开门。但是那个人继续敲门，而且越来越用力，并且说道：“喂！我知道里面有人，我们要检查一下窗户，你们得负责守住你们的窗户，明天要把钢窗焊死，还要发武器给你们。”听到这一番解释，我没有选择，只好把小门打开，并伸手开了大门的锁，把大门打开。

打开大门之后，我看那人并不认识。他一看见我，大概是认识我，吃了一惊说：“没有问题，你好好休息，明天下午，还是我来焊窗户。没事了。”他随后退出房间，问我要了那把大锁，从外面把门锁上。

第二天，还是他来，带了两个人和一些焊接设备。他自己进屋，把窗户焊上。走的时候，向我鞠了个躬，说：“老师，你安心休息，我走了。”

4月23日，清华“百日武斗”正式开场。当天，414是吃了败仗的，旧电机馆失守，很多人受了伤。

下午，汲鹏和印甫盛等来到“密室”。汲鹏对我说：和沈如槐商量过，现在科学馆不安全了。万一这里发生大规模武斗，你在这里有危险。我们建议你离开这里。初步考虑，请李衍平陪你到他家乡去躲一躲。他是广东汕头人，汕头交通不很方便，清华同学也不多，老团不容易找到那里。李衍平是414‘三七战团’的，是个写手，平时不大出头露面，陪你走比较安全，今晚就走。“三七战团”还派一个周家琮送你一程。东方红“233战团”的印甫盛、万润南负责送你安全出北京，并负责以后和你联系。”

印甫盛问我：“身上有没有钱？”

我说：“有，很少。”

他说：“李衍平也没有钱。”

我就请印甫盛先去人大找我姐夫联系，要点钱，并且通知家里，我目前安全。但因学校武斗升级，不得已需暂时逃离北京。

当晚，天黑下来以后，科学馆里人声嘈杂，许多414同学跑来保卫科学馆。有些老师，

同学和干部躲进了科学馆。每个窗户都安排了两个人守卫，武器是用水管自制的长矛。

大约7点30分以后，汲鹏带李衍平、周家琮和万润南来到科学馆，汲鹏给了我一把车钥匙，告诉我：“等一下，你紧跟我背后出去，外面有位同学在等着你。他不认得你，你也不认得他，但他认得我。他看见我，就把车给你，你开了车锁就骑走，什么也不用说。你走科学馆南边过小桥、工字厅、静斋门前，到停车场，然后径直到主楼前东校门。”

他看我的眼神似乎有问题，停了一下说：，你一个人，走静斋老团总部门前，他们绝对想不到‘罗文李饶’的首犯敢大摇大摆在老团总部前‘胜似闲庭信步’！”一边说，一边还给了我一身工人穿的工作服，一个平光眼镜。

最后，汲鹏说：“你在主楼前广场上和李衍平、周家琮他们会合，出东门走林学院。再往哪里走，你们自己再商量吧！”

我一句话都没有说。

等了两分钟，汲鹏似乎听到什么信号，站起来说：“走吧。”

我站起来，背了一个书包，拿了车钥匙，对汲鹏说：“替我向沈如槐、宿长忠、孙怒涛等几位告别，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

汲鹏说：“我们也感谢你对414的支持。”

我说：“我也是414的。”

汲鹏笑了，说：“对，咱们后会有期，祝你们一路平安！”

我低下头，紧跟汲鹏的背后。汲鹏带着我们在众人中挤出一条路来。中间有些人认出他：“汲鹏——”他就说：“等一下我回来找你。”到一楼后门的时候，可能为了安全，对进出的人实施很严格的检查，所以人很多，很拥挤。汲鹏好不容易挤出去，门外等着进楼的人很多。

汲鹏把我带到他说的自行车前，低声对我说：“走吧，一路顺风！”

我没回头，也没说话，开了车锁，立刻推车向南边的小桥走去，上了桥，我才骑上车，经过工字厅、静斋、停车场，二校门，我按照约定第一个到了主楼前。不一会儿，李衍平、

万润南也到了。等了半个小时，周家琮最后一个到，原来是自行车出了问题。会合齐后，我们出东门，经林学院，向市区去。

当晚住在政法学院周家琮的一个老同学所在的学生宿舍里。第二天一早就到周家琮另一位亲戚家里，等着上午和印甫盛及我姐夫会合。

突然推门进来一个男士，是清华建筑系刘鸿滨老师。这个世界可真是小，我越不想碰到建筑系的人，以免得人家追问刘承娴的事，就越碰到。打了招呼，我马上说，请不要说碰到我，连（夫人）高亦兰老师也别说，以免像林维南一样被追捕。

印甫盛来了，通知说姐夫在北京站和我见面。我们转到北京站，见到姐夫，得知这些天家里被搞得很惨，孩子也差一点被老团的人抢走，幸好大杂院里的一些邻居出面反对，才把孩子保下来。[注 18]鸿文最近一直躲在人大新闻系的暗室里，姐夫等人想过几天把她送到我妹妹那里（河北省赞皇县）等形势平稳了再做打算。于是，姐夫给了我一些钱和粮票，我们就在车站分手了。

按照 414 总部的安排，周家琮的任务是送我离开北京，于是我们也在北京火车站道别。

我和李衍平、印甫盛、万润南四人上了去武汉、广州方向的火车。印、万两人的任务是送我到保定。之后，我和李衍平经武汉去广州。

在火车上我们约定了几件事：第一，我的家属在广州有不少人，“罗征”什么有上百个，在广州容易被认出来，因此改姓谢，称“老谢”或谢老师，通信时用。姓谢也有谢谢大家之意。第二，万润南送我们到保定之后，不回学校，不参加学校武斗，而回宜兴老家，在家乡再准备一个避难点，以便衍平家里不能用时备用。阿南留下了家乡地址。第三，老印送我们到保定后，也不参加学校武斗。因“223 战团”本来主要是保刘冰的，现在形势有变，只好暂时停止活动，但还应该把材料转移，留在形势好转时再用。这段时间，老印负责中间联系。还有建 8 的同学沙春元（家在江苏常州）和笔名老沙的工物系的一位同学（家在湖南长沙），他们都是“223 战团”的人，他们在中国的中部。可以多搞几个备用的避难点，都由老印联系。第四，如果形势紧急，就发电报“老谢速来”，则走东线从汕

头经福建到上海再去宜兴，这条路比较安全。第五，没有老印的指令，不要妄动。如果失去联系，则找阿南。一般同学都以为他家在上海，不知道他老家在宜兴。

车到保定，老印、阿南和我们道别，下车。我和延平继续南下，目的地是广东——我的故乡，又是我很陌生的地方！[注 19]

逃难到陌生的故乡（节录）

4月26日到广州以后-----

5月1日，我们在广州汽车站坐公共汽车去衍平的家乡汕头-----我在汕头住了三个多月。

一天下午，大家接到派出所通知，要求从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回到汕头的大学
生以及外来人员都限期要报户口、登记。

-----（这一段是在派出所报户口的过程）

一出派出所的门，我看见门前这条不太宽的路对面有个大字报栏，我一看几乎昏倒！
因为上面仅有一张“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通缉令”，内容是：最近清华大学正在开展对“罗
文李饶反革命集团”的批判，特勒令这个集团的成员立即前来报到自首，争取宽大处理

这张通缉令中没有提到“罗征启”这个名字，但三次提到“罗文李饶”，且分别在“罗
文”和“李饶”上打了红叉。

可能是这边抄写大字报的人不知实情，以为“罗文”是一个人，“李饶”又是一个人，
所以按当时的惯例，在反革命分子的名字上打了红叉。

这倒救了我。-----

1968年6月12日凌晨大约五点左右，天还黑着（每天都是我早起）。这时还不到起
床时间，我朦朦胧胧做了一个梦：我梦见刘承娴老师两手各拉着一个她的女儿，从一个楼

梯上面走下来，对着我笑了一下。我刚要说话，就醒了。

这时我觉得头脑很清晰。奇怪的是，我知道她有两个女儿，但从未见过，但在梦里却出现了很明显、很清晰的形象。我一直很清楚地记得这件事。

1982年，我随刘达出访荷兰。刘达告诉我刘承娴的大女儿楼虹在荷兰读书。后来通过中国代办处（当时因荷兰政府出售潜艇给台湾，使中荷关系从大使馆级降为代办处级）安排，我们见到楼虹。我感到很奇怪，她竟和我梦里见到的一模一样。我想，也许她妈妈临终时把孩子托付给我。但是，刘承娴和饶慰慈最好，又和文学宓同在统战部工作，本应将孩子托付给文、饶。但是我和刘老师以及她的爱人楼老师都在同一个系工作，而且她当时知道我已经逃脱，所以——

我醒来以后，就叫醒衍平，把我的梦告诉了他。

他睡眼惺忪地说：“就是个梦吧，快睡吧，还能睡一会。”转过头又呼呼睡着了。

天亮了，吃早饭时，我见过妈妈，道过早安以后，我就将做梦的情况告诉她。我讲普通话，她听懂了，但她说什么我没听懂。后来衍平告诉我，妈妈说，罗老师想家了，你们陪他出去走一走。他心情不好，你们注意他的安全。

衍平叫来两位同学，一位是会拉大提琴的张同学，每次去游泳都是他骑车搭我去海边。他来了以后，大家商量先到公园去打桥牌。张同学又翻了翻日历：公历6月12日，阴历五月十七日。算一下下午还可以游泳。查阴历是因为算潮起潮落，要用阴历。也正因为如此，当天的日期我们都记得很清楚。

6月22日上午，邮局送来一封挂号信。在这之前，我们已经收到来自学校的好几封信，都是报告一些不好的消息，如5.30大武斗，双方死伤多少之类的。收信人都是李衍平。但这次却没有写收信人，寄信人只是写“清华大学”。打开一看信的内容是：刘承娴同志于1968年6月12日凌晨，因为伤重不幸去世——

看到“6月12日凌晨”，我们都张大了嘴，屏住呼吸，立即想起我的梦！

（下面一段写8月5日，离开李衍家去广州，在汕头与李母、李父告别的情景）

这一段经历证明，世界上还是好人多。有的人帮助或救助过你，你可能根本就不知道。所以我要报恩的名单比需要报仇的名单要长许多，而且越来越长。从这时起，我觉得我和基督山伯爵在对待“报恩”与“复仇”的处理和想法上分歧开始加大。

清华，我回来啦！

我们从汕头坐公交车 10 个小时后到达广州，我到鸿文家里住下。鸿文已先期从河北赞皇县到达广州，我们也算是团聚了。——在广州又住了一个半月。

我和北京、学校经常有联系。学校传来的消息还比较好，但许多人认为，老团的势力还很大。而且毛泽东“728”接见时对 414 的批评颇多，虽然没有定性的结论，但也是够团派利用攻击 414 的了。另外，据传文、李、饶还被关押在卫戍区；也有说并非关押，而是监护。所以，学校许多 414 的朋友一直主张我暂时不要回北京。

而我按照出逃时与汲鹏的约定，一直在等待印甫盛的通知。终于，9 月中通知到了。印甫盛在通知中说：蒯大富在清华的势力肯定翻不过来了，我们的意见是你可以回来了，工、军宣传队也认为你应该回来了。你买好票后，想办法通知我们。为保证安全，你的行踪还是保密为好。

9 月 21 日，我和鸿文上了回北京的火车。我们只通知了在人大大姐和大姐夫。他们的意见是等安全到达北京后，再设法通知学校。

我们的票是硬卧中、下铺。列车开出广州站时，我们对面的上、中、下铺都空着。过了一会儿，上来两个人，对了一下号，就落座在我们对面。这时，我突然觉得其中一个年轻人很面熟，我拼命去想是在哪儿见过。这时我的感觉和 130 事件团派到北京站我家里抓我时一样。我听到他们两人讲的是普通话，我就用广东话通知鸿文，说对面那个人可能——不是可能，我已经想起来，那是八九老红卫兵保卫组的，似乎也监管过中层干部的劳改队，所以肯定认识我。听说这批人后来大部分被吸收到团派总部的保卫组里。我告诉鸿文，

我现在的感觉和1.30事件开始时一样。鸿文惊恐万分。我只好说，现在他们不敢怎么样，到北京时再说吧。

火车到达衡阳，是个大站，上下车的人很多。这时上来两个人，他们用很标准的广东话和我们对面的那位打了招呼。

这下我知道坏事了，我们的语言优势没有了，不能无所顾及地说话了。我们两人面面相觑，话都不敢多说了。

这时，刚上来一位说：“我们在那边买了卧铺票，离餐车比较近，你们搬到我们那边去，可以打牌啦！”

于是，对面那两个人收拾东西随他们走了。

他们走了，我才感觉到我已出了一身冷汗。

火车到丰台站了，我们整理好东西，我穿上出逃时汲鹏给我的工装上衣，戴上他给我的平光眼镜，做好下车准备。列车在减速进站。我们从车窗看出去，认出站上很多清华的人。我又紧张起来！难道又是为我来的？这时已过了中午。

列车减速进站时，我从接车的人群中看到我大姐的身影。她也看见我们了，但没来得及打招呼。

列车停下后，大姐挤到我们这节车窗前说：“别下车，我上来。”

说罢，他就拼命向车窗东门挤去。在乘客下车不到一半的时候，她居然挤上车来了。她说：“怎么办？站上全是清华的人，老蒯和老团总部的的头头都在站台上，是不是冲着你来的？”

我茫然不知所措，脑子里空白了半分钟，等恢复了思考后对大姐说：“现在情况不明，但是拖延只能等死，必须马上行动。不然乘客走光了，就不好办了。这样我和鸿文分头走。鸿文直接回家，在家里等候。如果明天早晨以前没有我的消息，那就到学校报告军、工宣队。如果今天下午平安无事，那就通知我回家，明天回学校。我和大姐分头走，到火车站外的公交车站会合，会合以后先到日坛公园-----”

大姐插话说：“不，去龙潭湖公园，那里僻静。”

“就这样定，走吧！如果吃过午饭情况没有变化，你到龙潭湖公园来会我。”我对鸿文说。

说完我就低下头跟着一位较高大的乘客下了车，向出站口走去。

在出站口两边等候接人的人群中，我认出一个建筑系的学生周坚（他是支持414的，曾写过一篇著名支持414保护干部政策的大字报。他的观点是保护干部就应该像老母鸡保护她的小鸡那样——于是，团派的大字报嘲笑他，给他起了个雅号“老母鸡”。虽然他是个粗壮的男子汉，但团派的大字报中竟用了“她”字。后来414的同学也亲切地称他为“老母鸡”。）我和他对视了一秒钟，他若有所思，我没有打招呼就径直出站了。

我在火车站外公交车站见到随后而来的大姐，我们上了公交车，直接去龙潭湖公园。

我们姐弟俩坐在公园的一个长椅上等了一个多小时。忐忑不安的心情，使我们没办法相互了解我们南下逃难的情况及北京、家里的情况，我甚至连孩子的情况也没有问一声。两人的眼睛一直盯着一百多米外的公园东门。

这是一个开放不收费的公园。但是除了我们两个人，可看到的地方，连个人影也没有。

“鸿文早就应该到了，怎么还不到？会不会出事？她虽然没来过这里，你把公共汽车多少路都告诉她了，又不需要转车，不会有什么事。”我说。

大姐坐不住了，说：“我回去看看，这来回也就半个多钟头。”

我说：“好。”

大姐，临走又再三叮嘱我不要到处乱跑，失去联系不好办，又给我一张白纸条，如果有情况有变也来不及躲藏，逃跑，你就将这张纸条扔在这个长椅下面，我们再和学校工、军宣队联系。

我答应了，并送她到公园门口，看着她上了公共汽车。

这时诺大的公园，就我一个人了，够冷清的。又等了三刻钟，还是没消息，我有点不耐烦了，就向公园东门东大门走去。出了门就向他们来的方向望去，车很少，行人也很少。

忽然，我看见一辆吉普车，就像“1.30案”中绑架我那辆车一样，也像张师傅开来救我回学校的那部车一样，总之就是很熟悉的一部车，肯定是清华的车。我马上紧张起来，仔细看一下，不对头！这辆车正以很快的速度朝公园大门开来。我急忙进了公园门，像我坐过的那张长椅走去，我脚伤尚未痊愈，一瘸一拐的，好不容易走到长椅前，回头一看，真要命！那辆车已进了公园的大门，且径直向我开来。

情况不妙，我赶紧把那张小纸条丢在长椅下，然后向椅后面的灌木丛走去。当时，我的思想又是一片空白。

那辆车开得很快，到那张长椅前停下来了，我不敢回头，只听得一个女人用广东话叫我。

“阿启，不用怕，是工人宣传队的师傅听说你回来了，怕有什么事。所以派了一位姓刘的副队长来看你。”是我母亲的声音，这简直难以想像，但这是我的母亲无疑。

我转身走向汽车，妈妈眼含着眼泪跟我解释：工宣队来的时候，我们全家都不信，不肯说你的下落。他们再三解释，又拿出他们的证件，我才答应带他们来。

工宣队的刘师傅一边请我上车坐在母亲旁边，一边看着我一脸狐疑的样子解释说：“有人向工宣队报告说，看见你回到北京了，工、军宣队考虑你的安全，派我们来看看，看你有什么困难。考虑到你离京有大半年了，家里的人都在等着你，所以我们想你先在家里休息一下，过两三天我们再来接你回去。”

这样一说就解除了我的疑虑，安心坐车回家了。

一进家门，第一个迎着跑过来的是我四岁的女儿。从这时起，一直到晚上睡觉，她都不肯离开我。我抱着女儿，在母亲的陪同下，去访问大杂院里的每一户人家，感谢他们关照我家的老小。靠近院门的那“告密”的一户，已经搬走了。

晚上十一点，父母窄小拥挤的一间半房间里，睡了六七个人。我已经睡下，还未熄灯，忽然门外有动静，接着有人轻轻敲门。

我离门最近，起身先问：“谁？”

门外的人说：“我是工宣队的老刘。”

我披上衣服，尽快开开门。

门外一共有三个人，只有刘师傅进得门来。他说：“工、军宣队考虑再三，还是派我来和你们商量一下。你回到北京，学校已经有所传闻。工、军宣队考虑，学校情况还很复杂。有人贴大字报，要求审判‘罗文李饶反革命集团’，也有大字报说工、军宣队不应该把罗政启保护起来，应该让他接受审查和批判，就是这个‘反革命集团’，挑起群众斗群众，挑起清华的武斗——我们认为现在的情况对你来说还有一定危险，所以才来建议你今晚回学校住，这样比较安全。”

我听他这一说很气愤，蒯大富把我们打成“反革命集团”，现在还不肯放手。

我本想愤然拒绝，但刘师傅和颜悦色，且温和地说：“你可以再考虑一下，今晚不做决定也可以，我们是考虑你和你家里付出的代价已经够大的了，不要再大了，不要白白付出这些代价。我们工、军宣队付出的代价也很大，五条人命和七百多人的血，我们也不希望白白付出呢！”

我第一次听到五条人命和七百多人受伤，我感到非常震惊。他们为了清华，为了学生，为了我们这些干部，包括我，但是损失比清华、比师生干部还大——

我默默地穿好衣服，告别父、母、妻子。孩子已经熟睡了，我请他们替我跟孩子尽量解释清楚。我拿了一点衣物，就出门，跟刘师傅他们的车回校了。

夜里我们回到清华，刘师傅对我说：“带你去见两个人。”他叫车子开到新水利馆，在三楼的一间屋里，里面有一男一女，都披着军大衣。灯光较暗，我看不清他们的脸，只能听到声音。女的还比较和气，男的则傲气十足，有点匪气。

刘师傅小声对我说：“这是迟群、谢静宜同志。”

然后接着说：“迟主任，这就是罗政启同志。”

迟群拉长了声音说：“哦，你就是罗政启？”

之后，他们两人低声商议了一会儿，抬头对刘师傅说：“那好吧，就按商量好的意见

办吧。”

汽车又把刘师傅和我送到生物馆。刘师傅和我到了二楼东头南的一间教室，几位工宣队师傅把教师的讲台拉出来，放到教室中央。

刘师傅说：“你就睡在这里吧，这里还住着一些人，你暂时不能和任何人联系，你要上厕所盥洗室，打开门朝楼梯那边打个招呼，我们会给你安排。那里二十四小时有人值班，你这个门平时要从里面锁上，你早点休息吧。”

我铺好床，关了灯，也颇有睡意。但是几分钟功夫，我身上就起了许多大疱，痒得无法睡。我起来开灯一看，是臭虫，而且多得随便动一下就能碾死几个，翻过身都可以压死一片，我此生还没见过这么大的阵势。

我开门打一招呼，三个师傅过来看了忙说：“对不起，我去拿药。”

他们拿了一瓶杀虫剂，还有一个喷雾器，留下一位师傅帮我，对臭虫来了个歼灭战，这天晚上才能睡觉。

第二天，我向师傅要了扫帚和簸箕，扫了一堆死臭虫。

我发觉，在二楼当中楼梯附近的一间教室住着二十几个人。他们是集体行动的，我要去厕所，就把他们关教室里，等我用完厕所，再放他们出来。每天早晨，他们集体搞卫生，包括走廊的卫生。从第三天开始，他们已经注意到我了。他们搞卫生的时候，有个人故意在我住的教室门前多逗留了一会，故意咳嗽一下，我听出来是何介人。

我趴在门上轻轻说：“何介，是我。”

听得出来他笑了。“罗卜，我知道就是你。你没死？哈哈！饶慰慈和文学宓有消息吗？”

我说：“不确切，听说送去卫戍区监护起来了。”[注20]

何介人又说：“工字厅的人差不多都在这里。行了，再谈。”

以后有好几次，我们都是借打扫走廊的机会说上几句话。

十月中旬，有一天早晨，我感到情况有些变化。首先是早饭后，工、军宣队师傅特别来我住的教室看了看。过了一会又有一个海军的领导来巡视一番，工人师傅向我介绍说，

这是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副总指挥，姓刘，我们都称他刘队长，代表海军派来工作的。

我说：“我不认识他，但似乎见过。他是不是‘727’前来过？还有几位海军军官，对414比较好。当时他们就说是宣传毛泽东思想，制止武斗的。”

工人师傅没有回答。

我想不管怎么样，今天似乎会有些变化，希望往好的方向变。回校三个星期了，没有人理我。只有一天三顿时听全校广播。

刘队长来过以后，住在楼梯附近教室里的“走资派”们（我对何介人这样称呼他们，何介人以牙还牙，称我为“反革命”）似乎有些动作。不到九点都不见了，生物馆只剩下几位工宣队师傅和我了。我确定一定有事。

将近十点，生物馆有动静了，一个看着像领导的工人师傅带着几个人到我住的教室。他粗眉大眼，戴个眼镜，看起来正派、严厉，肯定是一位说话算数、毫不妥协的人。

一位师傅对他说：“老柳，这是罗征启。”

同时，扭过头对我说：“这是工宣队副总指挥柳一安同志，他来看你。”[注21]

我冲他点点头。

他上下打量了我一下，微笑地说：“你就是那个什么集团的头头？”

我说：“对，反革命集团。”

他笑道：“瞧你这样，一介书生，说你是反革命，没人信。”

工人师傅们都笑了，说：“我们都不信。”

柳一安收敛了笑容，严肃地说：“不管怎样，你都该见见群众了，在这里过隐士生活不行。上趟厕所吧，跟我走。”

出了生物馆，上了柳一安的车。他和司机在前排，我一个人坐后座。沿着小河就到了大礼堂后面。我这才发现，礼堂前的广场上坐满了人，大台阶搭了个台，挂了个大横幅，我从后面看不清写了什么。我正胡思乱想：不知开什么会，不知柳一安说的“该见见群众

了”是什么意思？

台上主持会议的人宣布开会，并说：“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清华大学最大的走资派蒋南翔拉上台！”台下一片口号声。

立即，我的思想和注意力被拉回到台上。我看见两个人把蒋南翔校长从台后左边押上台，让他低头站在前面中央。当然，这比66年“斗黑帮”时好多了，他的头没有那时压得那么低。

“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走资派高沂以及罗征启拉上来！”

听到我的名字，下面哄然乱了一阵，然后是一片口号声，我和高沂分别从台后左边和右边押上台。高沂站在蒋南翔的左边前台角上，我站在右边前台角上。台下黑压压一片，两个人各擒住我的一条胳膊，头也是押得不太低，我认为至少比以前文明多了。

然后就是批判，具体内容我没多少印象了。发言大体分三个部分内容：一是批蒋南翔的；二是挂在蒋南翔的名下批高沂；三是挂在蒋南翔的名下批我，主要是建筑系的“假四清”等等。念一段稿子，喊几十个口号。

在这一片口号和批判声中，我不知道蒋南翔校长怎么想，但是我知道高沂的感受。

好多年以后，我见到高沂，我问：“你当时怎么想的？”

高沂苦笑着说：“我当时一点没有听进去，批南翔同志的发言还没完，我已经睡着了，到批你的发言快完的时候我才醒过来。他们批你干什么？而且把你和南翔同志摆在一起，莫名其妙！”

不管怎么说，我的思想迷惘、混乱了一阵子。

上午的批判大会开完后，工宣队送我回生物馆。

午饭以后，一位师傅说：“明天开始，你归队吧。他们那间教室，已经给你腾出了位置，以后吃饭睡觉都跟他们一起了。你今天对大会有什么意见？什么想法？”

我说：“我很不满意，就这样让我去‘见群众’，这无异于告诉群众：工、军宣队对罗政启已定性，至少蒯大富他们可以利用来欺骗广大群众。”

整个下午我反复思考，但不得要领，我承认大会后我的顶牛情绪很大。

五点半饭厅的广播开始了，今晚的节目就是报道上午的会。

我忽然想起，宣布大会开始时，主持人说：“现在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清华大学最大的走资派蒋南翔拉上来！”接着又说：“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走资派高沂以及罗正琪拉上来！”这两句话意味深长，不但把蒋南翔和高沂、罗政启都划开来，就是高沂、罗政启也用“以及”两个字划开来。这句很高明也很巧妙，每个人都提到了，但有有所不同。想到这里，我脑子里消极顶牛的情绪和意见一扫而光了，我非常认真的听广播。

我发现这不完全是现场的直播。一是比较简单，二是凡是有明显的“打倒罗政启！”“打倒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分子 xxx！”——这些在大会中我肯定听到的发言或口号，在晚上广播里被删掉了。

我自己在听，房间里也没有其他人，我自己笑了起来！我真希望鸿文能听到，我估计今天大会以后她一定又会紧张起来。

正在这时海军宣传队的刘队长推门进来，他微笑着说：“怎么样，听说你很有意见两顿饭也没吃好？”

我笑了笑：“有点意见，我没有思想准备，我认为蒯大富他们会利用大会说已经把我定性，用来大做文章，但是听了广播，明白了，没什么意见了。”

刘队长这时语重心长地讲了一段话，我一直牢记在心，不敢忘记。他说：“你迟早要见群众的。但是怎么见呢，在我们的保护下去见吗？等着我们给你平反，做结论？开群众大会，替你解释？这样行吗？你想想。如今在清华，有几千人说你是反革命。414再好，最多打个平手。我们不来，414也得完蛋。我们再强，也不能强迫团派接受我们的意见。你们是不是反革命集团，我是知道的。但是要迫切广大团派同学接收，还要有相当一段时间，让时间来帮助消化吧。清华打成这样，我们很痛心，你们难道不痛心？难道只是蒯大富的责任？你们414没有责任？你们教师、干部没有责任？怎么办呢？可以这么说，清华

要和解，还得两派一起努力。而且原来吃亏受压的应采取主动。就像这次工、军宣队让蒯大富们打了，流了血，死了人，工人不干了，解放军不干了，要和解只能由工人、解放军采取主动。你很聪明，的确不愧是做宣传工作的，听听广播也可以明白我们的用心。希望你好自为之。行了，再见吧。

他走了，我后来再也没有单独见过他。但是他那一番话，我永远不会忘记的。

1968年底，我们这个学习班的人都回到自己家里住了。文学宓也回到工字厅了。

接着，有一天，宣传队一位师傅来找我，说：“饶慰慈身体好转了，我们觉得她应该回来和大家一起学习生活。但是她常常自言自语地说：‘罗政启死了’，我们告诉她：‘罗政启没有死，好好的在工字厅学习班。’她摇摇头还是说：‘罗政启已经死了。’等一下她来了，你做做她的工作。”

她来了，面色苍白，精神有时还有些恍惚，但我们见了面，握了手。也请文学宓过来了，大家相对沉默，面带一点微笑！

大家，尤其是饶慰慈，不能提起这场噩梦，不能再提起刘承娴老师——回忆这些事，对她是一种痛苦的折磨。

而把“罗文李饶反革命案件”彻底搞清楚、彻底平反，则是粉碎四人帮以后，刘达林克、胡启立等同志来清华主持领导工作之后的事了！

但是，不管怎么样，我已经平安地回到清华了。

清华两派的前途——宽恕与和解必胜

1968年7月27日，以蒯大富为首的“团派”闯了大祸——向进驻清华的工人、解放军宣传队开枪，打死、打伤了工人和解放军战士。

按说这一事件的严重性已确定蒯大富为首的“团派”失败无疑了，然而蒯大富居然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他在很长的时间内没有受到公开、公平、公正的审判和处理，

甚至没有见过群众。直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审判“四人帮”时，蒯大富、聂元梓等“五大领袖”才受到人民法院的审判和追究刑事责任。紧接着，文革中凡能找到主凶的命案，也都陆续依法受到审查和判刑。

“罗文李饶反革命集团”冤案本应随着蒯大富的倒台而得以平反、结案，但当时在清华执掌大权的迟群只是在组织批判‘516集团’时，顺带揭批了一下蒯大富为首的个别人搞的肉刑逼供和残暴无人性，并没有进一步公开揭露、调查和追责，对受害人也没有给予公平、公正的结论。

1978年，刘达到清华主持工作，他坚决贯彻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关于平反冤假错案的指示，组织人力对清华解放后至“四人帮”倒台期间发生的历次政治运动进行清理，对遗留的数以百计的冤假错案进行调查和处理。“罗文李饶”案件也是在这时才得以彻底平反和解决。

我也参加了部分清理、平反工作。但到后期总结时，我已奉调去深圳大学工作了，不太清楚详细的战果，但我相信数字是惊人的。

这些冤假错案的影响是深远的！多少家庭已经破碎，多少人受苦遭难，多少人犯错误，多少人葬送了大好前程，多少人背上了“打砸抢”“错误的包袱——

可以说，我们这个民族凡经历过解放后至“四人帮”倒台期间历次政治运动劫难的人，每个人的心灵上都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创伤！

在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中，没有真正的胜利者，都是失败者；也没有得益者，都是受害者；国家没有进步和发展，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真正的改善！

1980年4月的一天，我刚吃完午饭就有人敲我家门。

“谁？”我问。

“是罗政启老师家吗？”

我去开了门，一位女生对我说：“罗老师，你还认识我吗？”

“认识，你是孙铮。”我认出了他。

她说：“我代表孙耘和我自己来向您请罪。当时我们年轻无知，伤害了您和您的家人，很对不起你们。”

我问她：“孙耘现在在哪里？”

她说：“还关着，在海拉尔公安局监狱。”

“为什么还关着？”我问。

她说：“他是罪犯，这十多年里大部分时间是被关着。”

我问：“判刑了？”

“没有，但案卷上写的是反革命杀人犯。”她的态度很诚恳。

我问她：“你找我，希望我做什么？”

她说：我们只希望你原谅我们，孙耘如果能出来，他一定亲自来向您请罪！”

当时，我家很小，比较拥挤，我妻子和孩子都在注意听我们的谈话，无法午休。

我就把她带到我在工字厅的办公室，对她说：“你等一下，我拿出信纸和笔——

我的思绪一下子回到1968年初：幽灵似的吉普车，寒冷的三堡疗养所，阴森的化学馆牢房等等，一幕幕在眼前闪过。但是，除去那永远忘不了的爱人、孩子和老母亲的恐怖、焦急、无助的眼神，不幸遇害的胞弟的身影以外，在记忆里的孙耘只是一个大致的印象：一个英俊的北方小伙子，他是当时的主审人，孙铮负责记录。但他们问过什么问题，我是怎样回答的，这些都成为模糊的、散淡的、不清楚的记忆了。

我尽量集中精神，很快地给海拉尔市公安局写了一封信。我信中的大致内容是：孙铮代表孙耘来向我道歉，态度是诚恳的。我代表被害人家属负责任的声明，不再追究这件事了，请你们释放孙耘。

我把写好的信先给孙铮看了一下。她当场泪流满面地说：“罗老师，我没有想到您会这样做。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代表孙耘感谢罗老师。”

送走孙铮后，我还把这封信给我妻子，父母、姐妹都看了，他们都同意我的做法。于是，我将这封信通过清华的办公信箱寄送给北京市公安局，请北京市公安局转海拉尔市公

安局。

一个月以后，孙耘和孙铮一起来到我家。

孙耘说：“罗老师的信一去，海拉尔公安局就把我放了，公安局的同志看到罗老师的信也很感动。”

我说：“出来了就好，今后好好干吧！”

他们说：“我们两人想报考哈工大的研究生，不知行不行？”

我说：“我赞成，你们准备得怎么样？”

孙耘说：“专业方面我在监狱里有准备，就怕政治考试。”

我说：“政治好办。”立即打电话请政治教研室给我一份研究生入学考试复习提纲转给他们。他们参加了当年的研究生考试，孙耘总分第一，孙铮也考得不错。但是，哈工大看他档案里有“反革命杀人犯”的记录，不敢录取。

他们对我说：“即使哈工大不录取，我们也满足了，是我们有错。”

我考虑了一下，对他们说：“我想再试一下。”

我又写了封信给黑龙江省招办并转省委（见附件）说明情况。不久省委派了两位干部来找我，查询这封信的事，我说明这封信是我亲笔写的。

后来有人告诉我，省委书记杨易辰看了我的信，不敢做决定，送到中纪委王鹤寿那里，王鹤寿又送到胡耀邦那里。胡耀邦作了批示：这是件好事，责成中纪委第二办公室代中央起草一个文件，给黑龙江省委和哈尔滨工大党委，通知他们这两个学生可以录取，这样的人才应该爱惜，此事可以登报。

我没有看到原文，是新华社一位记者给我看的一份文件的复印件，我只记得大意。

我当时已到中央党校参加为期一年的第一期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一大群记者拿着有这个文件的复印件找我，要采访我，谈登报的事。

我认真考虑以后，又给胡耀邦写了封信，信的大意是：感谢您对我的理解和支持，但您关于登报的意见，我认为不妥。当前全国“打砸抢”的遗留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如果

这件事一登报，容易使文革中的问题一风吹。这样可能造成反复。如果您认为必要，是否登个内参就可以了。

信写好了，仍请那位新华社记者带回呈胡耀邦。听说胡耀邦又立即批示同意。后来，新华社“大参考”把我的信摘了几段写了个报道登出来，我在中央党校看到了。新华社还寄了一份给我，被同学传阅时丢失，没能保留下来。

此后，我和孙耘、孙铮成了朋友。他们经常来看我。我调到深圳工作后，他们还来过几次。1982年，他们到清华看我，告诉我哈工大有意派孙耘去美国深造，想听听我的意见。

我说：“这样的事还问我干什么？”

他说：“我今天的一切都跟您的宽容有关，我必须听您的意见。”

“你自己的意见呢？”

“我不想去。”他很坚决。

我知道全国当时正开始清理“三种人”（注：所谓三种人即打砸抢分子，反军乱军分子以及群众组织里的坏头头）。像他这样的情况，我估计很难批准出去，即使批准出去也可能半途被调回。因此，我说：“我同意你的选择，你们先干出点成绩再说吧。”

孙耘夫妻二人很明白，如果没有胡耀邦的指示和干预，他们的问题是很难解决的。因此，他们每年都到胡耀邦家中看望。尤其是耀邦逝世20周年时，他们到江西共青城耀邦墓前拜祭，又写了一些诗文以为志（见附录）。我看了也深为感动，很受教育。我觉得他们是比较彻底地卸下包袱了，我也更加体会到胡耀邦彻底平反冤假错案的伟大意义，不仅犯错误的人放下了包袱，受害的人得到平反也放下了包袱。

孙耘的问题得以妥善处理之后，清华校内了解内情的人当中，无论是团派还是414的多数是支持的，但有人说我这是“以德报怨”，是“东郭先生”等等。

我记得小时候。父亲要我背《论语》，当时我能背得下来，但不懂。父亲有时也讲解一些章节，但讲解过的现在也忘得差不多了。我模糊地记得其中有一段是关于“以德报怨”的问题。父亲说：“孔夫子不赞成‘以德报怨’，更不赞成‘以怨报怨’”，但是应该如

何，我不记得了。

当我听到有人说我是“以德报怨”，我不同意，立即翻阅《论语》。结果因多年不读，一时找不到有关的段落。直到前几年，偶然听到电视节目里讲《论语》，刚好讲到这一段：“有学生问孔子，‘以德报怨’怎么样？孔子说，‘何以报德’，然后孔子解释‘以直报怨，以德报德’。”“以直报怨”：应该怎样就怎样，以正直的态度对待怨仇，这才是正确的。

我不同意有些人说我是“东郭先生”。因为我在对待个别残暴无人性的打手的处理时，并没有手软，比如对冯家驊。专案组曾征求我的意见，我说，他现在在哪里，找到他再说，不能轻易放过他。

专案组查找的结果是：他在河北省北部一个工厂里当工人。因为他在文革中那一段不光彩的历史，周围没有人理睬他。“老团”不理他，“老四”更不理他，他一直独来独往。后来找了一个女工结了婚。当那位女工知道冯家驊在文革中的暴行时，竟然吓疯了。由于冯家驊知道她是因为自己的问题造成精神失常，所以只能一直守着她，法律也不允许离弃。

专案组的同志问我：“你看怎么办？”

“算了，到此为止吧，上苍已经有惩罚了！”我说。

我脑中立即浮现出这个五短身材、小眼睛，留着寸头的小个子同学，他凶残地打我的情形历历在目。尤其是他打饶慰慈、文学宓更是凶残，打得他们浑身伤痕累累，惨不忍睹。

我曾无数次地发誓一定要惩罚他！但是现在，我想如果抓了他去坐牢，那么他的妻子谁来照顾？够了，够了，这就是“以直报怨”了！

2009年，在一次聚会时见到汲鹏。汲鹏告诉大家他见到“牙科大夫”了（因为冯家驊曾用老虎钳子拔牙来逼供，所以得到这样一个外号）。接着，汲鹏介绍了他与冯家驊见面的情况：

我（汲鹏）说：“这不是‘牙科大夫’吗？”

冯家驊说：“是的，我错了，我现在改行了，我学了针灸，现在为人治病，已经治好

了一些人。我要用救死扶伤来洗刷自己过去的罪行。”-----

我注意在场的人都很安静地听汲鹏讲，并且都点点头-----

这件事更加引起我的深思：我为什么不管冯家驊是否改过自新，是否对自己错误有认识，是否已经受到道义和法律的惩罚，就发誓绝不放过他？这是“以直报怨”吗？当然不是！我认为我还沉浸在谁是谁非，报仇雪恨的情绪里。以德报怨，以怨报怨，以直报怨，都是要“报怨”，是怎样去“报”的问题。“报怨”又是为什么呢？

我对照《基督山恩仇记》中的报恩复仇情节反复思考着，我认为基督山伯爵报仇的手段太狠了，过分了。而我们对冯家驊的态度不是也太狠了吗？

我认为自己这样的思考太浅薄了。我想，我们应该把“和解”的旗子亮出来。这个仇，报还是不报？何时报？如何报？其实都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我们最终的目的应该是和解。两派要和解。清华清理了积累多年的冤假错案，也是为了达到全校的和解。全国也一样，应该和解！

中国自古以来就不断地演义着各种各样的冤怨相报，不断仇杀的历史。这种冤仇相报的意识和文化，一般分为三个层次：一是有仇必报，以血还血，以牙还牙。有仇不报非君子。报了仇，才够中国人所谓的“义气”。二是怨仇必报，不过报的手段、方法和程度比较理性。三是以直报怨或以德报怨，“报”的目的是“和解”。

孔子在《论语》“宪问篇”第十四中关于“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的论述，留了相当大的空间。看来，他并不赞成以怨报怨的杀戮文化，也不赞成不加分析的“以德报怨”的东郭先生的愚蠢做法。他主张的“以直报怨”，似乎概括了中国传统的复仇观：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也就是说，无论如何，目的是要“报”的。

而佛教则主张“以德报怨”。目的是化怨解仇，达到和解。

但是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很少用“和解”、“和谐”、“妥协”等词，尤其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期，“和解”简直是“大逆不道”的。而代行其道的是胜王败寇的“镇压”。这种以暴力取得的胜利，只能用暴力来维稳。这样的维稳，只能越陷越深，越维越

不稳，不可能持久稳定的。

在中国历史中，多数是第一层次。达到第二个层次的也极少，第三个层次几乎没有。然而世界上许多国家和民族，却有许多达到第三个层次的事例。

如美国的南北战争。从1861年到1865年南北双方打到四年仗，各死伤数十万人。直到南军弹尽粮绝，南军的李将军不得不向北军的格兰特将军请降。李将军在带领部下前去投降时，要求部下穿着整齐。他说我们打败了，但要败的有尊严。在请降的谈判中，李将军提出希望：我的骑兵和炮兵部下，许多人是带着马匹来参军的，希望这些属于私人的马匹能够还给他们。格兰特将军说：这已经在我们的考虑之内了，如果没有马匹，他们将无法收获下个季度的庄稼。不仅马匹，甚至武器也发还给个人。就这样，没有绞刑，没有屠杀，没有监狱，很快南北和解了。从此美国没有再爆发过内战，和平使美国发展成为当今世界之强国。

再如南非，本是个种族隔离非常严重的国家。曼德拉本人就被白人政府关押了几十年。但他在当选为总统后，立刻签署了取消种族隔离，达到民族和解的法令。他自己带头宽恕在种族隔离时期对自己犯罪的人和事。又如曼德拉的第二任妻子温尼，自己是个黑人，受过种族迫害，但她自己也犯过错，最后觉悟了，讲出自己的错误，却用真相换取受害者的宽恕，最后达到和解。一个看来绝无可能用和平的方法达到民族和解的南非，他们成功地运用了“真相——宽恕——和解”的办法，确确实实达到和解，实现了真正的和平。

我想，在我们这样一个长期以阶级斗争为纲，以斗争哲学为自己主要的价值取向的国家，要出现这样感人肺腑的故事，是不太可能的。这难道不让我们这样一个号称礼仪之邦的大国脸红吗？难道我们不应该向这些国家学习吗。

要化解清华各派之间的矛盾，只能走“真相——宽恕——和解”这条路，这才能真正体现清华人的胸径，才是对清华校训的最好诠释！用真相换取宽恕，最后达到和解，希望这种宽恕、和解的文化，能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的主流文化！

2011年9月6日完稿。

【罗文胡注】

罗征启《清华大学文革回忆录》（四）评注

胡鹏池

[注 01]随笔：做根儿上的事

虽说人类是由动物进化而来的，所以“广义人性”中既有人性也有兽性。但是动物既有食肉与食草之分，也有热血与冷血之分，还有狼虎豹与猿猴猩的不同种类，所以兽性中也不都全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在高等动物中也有团结、分工与协作，也有善良也有爱；虽说表现形式是简单的、重复的，但也有发展、演化及进化。

虽说中国传统文化既有“性善论”，也有“性恶论”，但两者从来不是对等的五五开。“性善论”一向占有主导地位，《三字经》的第一联“人之初，性本善”唱彻华夏千古。“性恶论”之只一句性恶，大本已失矣。

所以说：人类是“善恶并存”且“以善为主”的群居动物，由这样的人类所组成的人类社会，也是“善恶并存，以善为主”的。

“以善为主”不仅仅是人类社会的基本性质，也是人类社会不断由低级向高级、向更美好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根本动力。

什么叫“自信”？这就是人类对自身及对自身社会根本的“自信”。由这一根本自信派生出来的其它“自信”才有可能是正确的与合理的，这才是不言而喻、毋需证明、万古不变、颠扑不破的真理。

清华校友反思清华文革，也必需建立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我们必需确立这样一个信念：绝大多数人都是反对暴力的，尤其痛恨那些残暴的残酷的、灭良知灭天理、无人性反人性、比法西斯还法西斯的暴力行为。

这一点是群众的绝大多数，当然也是清华师生绝大多数人的共识。毋需任何说明，也毋需任何附加条件。

在这一点上，是不分派的。不分八八与八九，不分四一四与团派，也不分清华师生与一度进驻的工宣队。

具有极左与独裁特色的红卫兵政权的本质是残暴性与欺骗性。但是当年绝大多数师生员工对于清华文革中极少数极端分子超越人性底线的暴力行为并不知情；有的人虽有耳闻但知悉很少，更不知道已经发展到如此严重的程度；甚至即使到现在，知道的人仍然很少，知道的内容仍然不多，不全面、不深入、不系统。

所以，虽然文革反思已经进行了半个多世纪，但直到现在，对于文革中超越人性底线的法西斯暴行的揭露与披露，批判与谴责，仍是文革反思中的重要内容，甚至是最基本的、最根本的内容。在这一点上，两派校友是一样的，只有程度上的差别，没有性质上的不同。

有的朋友对我花这么多的精力录入罗征启的这本书，又花更多的精力写这些连篇累牍的“注”不能理解，难于接受。我的动机与目的只有一个：通过披露与揭露、批判与谴责这些超越人性底线的法西斯暴行，呼唤正常人性的回归。

没有正常人性的回归，我们的社会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正常的、现代的社会。

我相信凡认真阅读、认真思考、参与讨论的校友们都会有这样的态度。

有一位校友这样说：“为使领袖脱罪而把一切坏事推给下面，那是卑鄙；为证杀人凶手无罪而归于上面唆使，那是无耻。”

我和但燊在《清华七二七事件》一书的“不结束语”中这样说：在欺骗面前，我们或许会迷惘；在暴力面前，我们或许会软弱；在潮流之中，我们或许身不由己；但在任何时候，我们绝不能做超出人性底线的事。

我们这样做，并不是只挑容易做的事情做，而是在做根儿上的事。

就在我已经完成这篇短文的今天（2017-12-4），我在微信群里看到一则视频《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市长》，视频的最后引用了爱因斯坦的一句话：

世界不是毁在作恶者的手中，而是毁在袖手旁观者的手中。

这不是“心灵鸡汤”，而是毋须证明的社会学、历史学公理。

[注 02] 冯家驷：清华电机系电 002 班学生。（即大一）

随着清华文革反思的不断深入，一批打手从历史的黑龙潭里浮出了水面，人数并不很多，但也并不很少，大概在五、六个至十几个之间。冯家驷位列其中，是最残暴的打手，故而也是代表人物。这批打手们所施行的暴力手段多种多样，不仅有拳脚殴打、棍棒殴打、特制的工具殴打，如在木板或木棍上加钉子，还有推搡、罚站、灌开水、施迷幻药品，甚至还有将亲属、如年老的父亲及未成年的孩子抓起来当人质等等。据说多达 20 多种。

就冯家驷此人，五毒俱全，以“拔牙”为冯氏特色。冯家驷用卡丝钳掰断了文学宓三颗牙，拔掉了贾春旺一颗牙。蒋同学（男）曾问过文学宓，顾同学（女）曾问过贾春旺，均得到过肯定的回复。

于是很多校友愤怒而好奇：冯家驷这个冷血动物究竟长了怎样一副的人模狗样？

“罗书”后文有描述：其人是“五短身材、小眼睛，留着寸头的小个子同学。”

[注 03] “罚站”是团派打手们在刑讯逼供中的常用方法。

蒋南翔曾被罚站三天三夜；

刘冰曾被罚站两天两夜（在 200 号），到了第三天，则不顾一切地躺下了；

罗征启仗着自己年青，主观上想要比蒋南翔表现得意志更坚强。这个意念支撑着他在三天三夜后又继续站了 8 个小时，也即共站了 80 个小时，然后人事不知，晕倒在上厕所（被临时指定给罗当厕所的下水管道口）的路上。

据资料记载，文学宓被罚站五天五夜；贾春旺被罚站七天七夜，两次，举着凳子。

有一位校友出于善良的动机，不愿意相信这种事，对我诘问道：@胡鹏池 站五天五夜，七天七夜怎么界定的？我觉得不可能连续的。不睡觉？躺着不让睡觉也做不到。

我的回复：@XXX：谁能证明五天五夜、七天七夜是可能还是不可能？但是“五天五夜”的说法是文学宓亲口对罗征启说的，“七天七夜”的说法是见诸于“84 人大名单”，

这就不能说是言之无据了，而是言之有据了。

[注 04] 附有罗征启签名，内容是“印甫盛讲过，林彪是极左思潮的总根子”的这张纸条子，几乎是团派“罗征启专案组”刑讯逼供中得到的唯一收获。

罗征启讲：这是一张“使我终身引以为憾的字条”。根据罗书的叙述，我相信这张纸条子是存在的，是冯家驊施行了迷幻药后的结果。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这是罗征启脑子里的思想碎片，在“迷幻药”驱动下的聚合。

[注 05] 据校友微信披露，羽毛球队的这两位华侨，大个子叫李木松，水利系七字班；小个子叫陈奋光，工物系八字班。二人均为团派专案组的打手，二人均已去世。（详见[附件一]：丁正明、金水高：《夜闯三堡》）其实，这二人的名字在其它资料中也有，如“84人大名单”。所以没有必要为他们保密。

[注 06] 孙耘，原名孙毓星，天津人，1945年生，无线电系八字班学生，团派总部委员，当时是“罗征启专案组”组长。

在罗征启故事里，孙耘同学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

其一：导致罗弟“罗征敷之死”的行动，孙耘是带队的，是三名主要“案犯”之一；

其二：“孙耘忏悔、罗征启宽恕”是清华文革反思中的一个影响深远的事情。

1968年的2、3月份，当时蒯大富们还没有完成制造“罗文李饶反革命集团”，至少还没有这个名称，但已经有个代号了。据孙耘的回忆文章，代号叫“九六支队”。“九六支队”专搞谭浩强、罗征启等干部专案。

我至今未能搞清“九六支队”的名称是怎么来的？是不是1967年9月6日团派总部决定成立这个专案组的日子？（存此备考）随着形势发展，“九六支队”逐渐演化成规模庞大、影响深远的“罗文李饶反革命集团专案组”。

1968年4月3日夜，“罗征敷命案”发生后，主要涉案人员孙耘、张建国、王庆章三人于4月4日凌晨被公安局拘押，4月5日早上被送到半步桥看守所。后来这三人先后离开半步桥看守所（不知先后，不知详情），参加公安局办的“学习班”。直至工宣队入主清华后，8月29日被公安局送回学校参加毕业分配。

孙耘被拘捕后，“罗征启专案组”的后期组长当然就不再是孙毓星了。

据有关资料记载：“罗文李饶反革命集团”专案组：组长王子瑜，副组长王良生、王会元。罗征启专案组：组长王子瑜（兼）；副组长王良生、王会元。

另文学宓、李康、饶慰慈、刘承娴各设有专门专案组，每个组都有各自负责人，但打手不一定是各自的，也许像“共享单车”一样，“共享打手”。冯家骊就在好几个专案组充当过打手。

[注 07] 罗书中多次提到冯家骊“打我不是最狠的，打饶慰慈、文学宓更厉害”，这是事实。但原因是什么？罗书却没有进行分析。

当然，这不可能是冯对罗有什么“区别对待”或“手下留情”。

我认为主要原因是时间不同了。时间不同，形势不同，团派总部对专案组下达的审讯任务与目的都不尽相同，氛围不同，手段也不同。

绑架、刑讯罗征启的时间早，在1968年的2、3月就开始了，而绑架、刑讯饶慰慈、文学宓、刘承娴发生在4月，相隔两个多月。这期间又发生了诸多事。

1968年3月27日，罗征启越狱刺激了团派决策者及其打手们。

为了抓捕罗征启，孙耘带队于4月3日晚到罗的父母家抄家，于是发生罗征敷命案。

4月4日孙耘、王庆章、张建国3人被公安局拘押。

制造专案的原始目的和根本目的是为了摧毁“414”，谁知道这个目的还远不可期，自己却进去了三员干将。于是又增加了一条目的：要为孙、王、张脱罪。于是，团派总部立即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扩大抓捕对象，扩大专案组规模，特设了专案组下的保卫组，

将200号建成拘押、审讯基地，企图将罗文李饶的“反革命罪”办成铁案。

团派在错误与罪恶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了。

4月14日，绑架文学宓、刘承娴；

4月17日，扣押饶慰慈；

4月18日，蒯大富召开《彻底摧毁罗、文、李、饶反革命集团第二次大会》，正式给罗、文、李、饶扣上反革命集团的帽子。同时向全国各地发出对罗征启的“通缉令”。

4月23日，“百日武斗”开始。团派对“罗文李饶”的刑讯逼供急剧升级，作为专业打手的冯家驊其残暴性、兽性同样“与时俱进”，并受到重用。

[注08] 随笔：逻辑是近、当代人文学科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罗征启喜欢两本小说：一本是中国的《三国演义》，另一本是外国的《基督山恩仇记》。罗征启说在这两本中外小说中，更喜欢的是《基督山恩仇记》。

毛泽东推崇《红楼梦》，他说：中国一穷二白，还有一部《红楼梦》。

其实，就其普及程度及在中国文化、东亚文化的影响力而言，无疑得首推《三国演义》。著名学者杜君立认为《三国演义》是中国人的《圣经》，我深以为是。

罗征启最喜欢《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与赵子龙，我也一样。固然这也是读者们普遍的感情倾向。其实，刘备的“勿以善小而莫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也是千古名言。

在中国的古典小说中，除了四大名著，还有《老残游记》、《聊斋志异》、“三言两拍”等等。我比较喜欢“三言两拍”这样的市井小说，校友唐伟推崇《聊斋》，称其是中国最好的短篇小说。外国小说还有《约翰·克里斯朵夫》、《红与黑》、《巴黎圣母院》、《苔丝》、《战争与和平》、《复活》、《怎么办》等等，举不胜举。

理工科生们受专业限制，时间也有限，一般都没有时间对文艺小说做到博览，但总得有所涉猎，放在床头或马桶旁，一有时间翻一翻。尽量多读一些，有一些基本的常识。

我要强调的是，人文精神也好，人文学养也好，并非文科生的专利，最基本的来源是

人们在社会生活（社会实践）中的感悟，文科的专业培养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理工科生受到严格的数理化训练，以及大量的科学实验训练，形成了一定的逻辑思维能力与逻辑思维习惯，这是非常重要的。逻辑是西方文化中重要的人文精神，中国古代的人文精神中虽然也有逻辑，但不明显。如“白马非马”、“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等。而在近当代的人文精神中，逻辑也已经成为东方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注 09] 罗征启说：“两个窝头、一块咸菜，一暖壶冷水，这是我一天的标准口粮。”

团派渣滓洞式的“集中营”不仅是对罗征启如此，其它“案犯”基本也是这个待遇。

刘冰回忆说（为了）准备迎接更加艰苦的日子到来，作长期斗争的准备，开始了室内锻炼，并要求每餐饭增加到两个窝窝头，如果不给，就绝食抗争。

韩丁《百日战争》一书中，工宣队领导人之一吕方正叙述了他于8月10日这天上午率300工宣队捣毁团派的“渣滓洞”式的集中营——“200号”所亲眼看到的情景：

我们发现里面的情况极为糟糕，这地方比任何监狱更恶劣。——在7月份这样热的天气里，俘虏们只能穿着短袖衬衫睡在地板上，一天只有一个馒头（一种蒸食的面食）一碗凉水——通过门上的小孔送进来的。——”

[注 10] 李兆汉(1935~2001)，男，汉族，1961年清华大学建筑系毕业。曾任国家教委直属机关党委委员、中国教育报社社长兼党委书记、中国教育报社正司级调研员、编审。笔名：照寒。2001年3月2日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终年66岁。

我认识李老师，到过他家，也认识他的夫人廉慧贞老师。1967年年中，曾与李兆汉在四一四《井冈山报》社共事半年左右，有着美好的记忆。

[注 11] 陈天晴校友 2017-10-23 即时微信：

@胡鹏池 去城里接罗老师的是我带领的几名老李班（胡注：即414的“李文忠学习

班”）成员，但不记得具体人了-----”“也许，那个大个子就是我吧。”“的确是从东校门进入的”，“我的任务是接到罗老师，直到送进科学馆。”“尹是肯定参加了此次行动的；是他向我讲了此次行动的计划。”

[注 12] 沈如槐书中对这件事的回忆，在时间上、一些枝节问题上有所不同。

关于此事的回忆与叙述，除了罗本人外，还有唐金鹤《倒下的英才》，沈如槐《清华大学文革纪事》、孙怒涛《良知的拷问》、孙耘《我的文革心路历程》都有比较详细的叙述。各种版本的回忆在细节上都有各自的错漏，也有相互矛盾与冲突之处，尤其是孙耘的文章，有些缺失很难用“遗忘”解释。

我认为，今后如若要对整个事件作严肃研究，还需以罗书为基础，辅以大量延伸阅读，进行更认真细致的综合。

[注 13] 蒋南峰 清华六六届无线电系学生，414 总部核心组成员。

随笔：反思清华文革暴力现象，有两个问题需要想清楚

罗征启在科学馆“密室”听到的这段话，说明了 414 中也有人主张以暴抗暴。而且具体的行为，也曾经不止一次的发生过。

王以平校友发来一则微信：“我在科学馆被困之前几乎每天都会去那里看看。为什么已经不清楚了。但在顶楼见过有人被反捆着手，象虾米一样蜷缩在地上，有人在旁边用小弹弓打他（她）。这使我很反感。当初之所以参加 414 的‘三七战团’，就是有一天晚上睡不着觉，去大礼堂看大字报时碰到一群人用皮鞭赶着我们的老师，边跑边打。我对此极为反感，才远离那些造反派的。”

叶志江对在科学馆当俘虏的回忆，也证实了 414 的暴力存在；中层干部陶森（女）遭遇 414 非法绑架、非法关押；何东昌、李传信挨过 414 人的耳光或拳头等，都是 414 的暴力记录。

这样的事例，如果用心去搜集，可能会有十几条，甚至更多。当然可用“不可避免”解释，但“不可避免”同样是不能否认、也没有到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

反思清华文革两派斗争中的暴力现象，有两个问题必需想清楚：

一、四派不能只看到团派的暴力，而否认自己这派也存在着暴力；四派也不能只看到团派暴力的恶性事件，而宽解自己这派一般的暴力事件；

二、团派不能以“两派都打人”为借口，否认团派的暴力行为在数量上、程度上都远远超过了四派，因而在性质上也与四派有差别。

大家都是理工生，不会不懂得数量级的概念；大家都有基础的哲学知识，不会不懂得量变引起质变，程度决定性质的道理；大家也有起码的法律知识，不会不知道民事案与刑事案的区别。

最近，一位团派敏感人物私下坦言道：反人性的恶性事件都发生在团派，对此是谁也无法否认的。

诚哉斯言矣！这是这位校友私下里表达的认识。但他没有在公开场合坦陈，这正是由于派性影响，缺少了表达的勇气。当然这仍然是可以理解、谅解的。

反思文革的每一步都有不同程度的局限性。除了认识上的局限性，还要考虑“朋友圈”接受的程度，也要“讲义气”等等世俗的因素。

[注 14] 随笔：人的“人性表现”也是有层次的

蒋南峰作为 414 核心组成员之一，他反对暴力的态度是鲜明的、坚定的。414 的主要负责人沈如槐及后期的《文攻武卫指挥部》代总指挥但燊的态度也是很鲜明的。

迄今为止，我们没有发现 414 的主要领导层中有人公开或暗地里主张使用暴力。

然而，团派的领导层中主张暴力的却不乏其人。

如崔兆喜。“罗文李饶反革命集团”及“十二人反党集团”中所谓的“案犯”们，大多都是蒯大富直接下命令，或经蒯大富同意，经手人往往是保卫组组长崔兆喜。有人劝他

要慎重，要摆事实、讲道理，崔兆喜却说：“对于一小撮反革命的死硬派，没有什么道理可讲，没有什么事实可摆，要摆的只有暴力，要讲的只是专政。”

迄今为止，我们没有发现团派的领导层中有人坚决反对使用暴力。但是，没有发现不等于没有，更不能断定绝对没有。

宋执忠校友说：“我们系力05班基本上都是老团，在井冈山早期较积极，刘泉，张云辉，张学琛都是老团总部委员。刘泉和云辉前期名声还挺大，均属于井冈山兵团元老。毕业后张云辉和我都分配到河北隆化农村插队，当时关系很好。他曾和我说，他派战后期之所以不积极，被老团叫外号‘井岗公子’，他和刘泉都对老团用武力整人和发动武斗持反对意见。好像刘泉还在团派总部开会时公开表示过反对动武的意见，但不被蒯鲍所接受而成少数派。武斗期间他每天到游泳池游泳。但此说法我没做过核实。不知是否和我说的是虚话。”

无须核实，这番话也可信。问题不是出在刘泉、张云辉、张学琛这些一般的团派总部委员身上，问题是蒯大富本身就是一个极端极左分子，由他当团派的班长，团派的鹰派人物就逐渐受重用，鸽派人物就会逐渐被冷落。

例如，狗熊作为一个有命案在身的人（打死孙华栋的主要凶手），就在727前一星期，居然还被蒯大富突击提拔为总部委员。蒯大富的用人路线可见一斑。

人性是复杂的，人性表现也是分层次的。有些团派头头在某种场合主张暴力，而在另外的场合却也有反对暴力的言行表现。

例如任传仲。在清华文革中，任传仲无疑是一个暴力的代表人物。但他毕竟也是人，有时也会有人性的表现。1968年7月间，崔兆喜曾提出一个建议“伏击414的卡车，多打车上的人”，“真要是打死414一、二十个，老四就根本不能打仗了，办丧事都办不完。”这真是一个疯狂的罪恶建议，然而，首先站出来反对的却是任传仲。任说：“这是肉体消灭主义”。

崔的建议没有被任传仲采纳，会上也没有被蒯大富肯定，然而会后却被蒯大富用实际行动接受了。7月20日深夜（21日凌晨）蒯大富亲率一支短枪队，在林学院西路北的稻田壕沟里伏击了一支由二十多人组成的414全文职队伍，这支队伍是进城去搞宣传的。蒯大富率领的短枪队开枪打伤两个人，造成“两枪五窟窿”的神奇故事。

然而，即便是这样的蒯，仍然是有人性表现的。他下令开枪对准下半身。所以，这两人受伤的部位在大腿，否则就是两条命案。

两人之受伤拜蒯大富所赐；两人之活命也拜蒯大富所赐！

（以上参阅胡鹏池、但燊著《清华七二七事件》第121页）

但是，蒯大富之所以这样下命令是不是完全归结为“人性善”的表现呢？可能也不尽然。有相当重要的原因是出于“恐惧”，恐惧成为具体的杀人凶手，而在日后遭报应，遭法律的惩处

[注15] 林婆婆：罗征启太太梁鸿文的大学同学林维南的母亲，印尼华侨，当时已80多岁。团派专案组在抓林维南时，她上前阻挡专案组抓自己的儿子，却被专案组的一同学一脚踢倒，当场摔伤，数日后死亡。

如今的人们常常忘记了林婆婆之死，其实这也是一件情节恶劣的非人性的恶性事件。面对一个风烛残年的老太太，这个畜生怎么能下得了脚！

清华文革期间由于两派斗争（过去常以“两派武斗”为划定界限）导致的死亡人数，有多种版本：

①“12人”说：不包括林婆婆在内。理由是她并不是死于被团派专案组人员推倒的现场，而是被推倒而致伤，又由于是80多高龄的老人受到了过度的惊吓，三四天后才死亡的。

②“11人”说：不包括罗征敷、林婆婆，理由是他们不是本校人。

③“10人”说：不包括刘承娴、罗征敷、林婆婆在内。理由是他们不是直接死于武斗。

我认为以上三人的死亡原因都与两派斗争有关，所以，“13人”说更为合理。（详见：

胡鹏池、但粦著《清华七二七事件》第57页)

读了罗书后，我还认为黄报青之死主要也是两派斗争引起的，所以应是14人。

[注16] 罗书“在回学校的路上，罗正敷因反抗遭殴打，并被用麻袋套住头，造成窒息身亡。”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

实际情况是：4月3日晚，孙耘带队9人，乘吉普车到罗家父母所住的大杂院外，孙耘带6人进院去罗家搜查照片，以便发《通缉令》，留在车上的张建国、王庆章、及司机小李等三人在院外发现一个急速跑出的身影，立即驱车追赶，追出几百米后将他抓到车内，发现是罗征启的弟弟，张、王将其按在车厢中间的地上，王庆章当场踢断了罗征敷的两根肋骨。怕他的叫喊声惊动广场上执勤的解放军战士，又向他的口中塞了一团擦汽车用的棉纱。孙耘说：“王同学并无此类经验”，竟将棉纱塞得过深，堵住喉咙，结果‘闷住呼吸管道，窒息死亡’”。

(参阅：孙怒涛著《良知的拷问》第144—145页；唐金鹤：《浅谈〈良知的拷问〉中孙耘同学的，〈我的文革心路历程〉》《记忆》2013年某期。)

我认为，罗老师以至诚之心对待孙同学，但是，罗对孙的宽恕与孙自身的忏悔是不对等的。这也是我的一点至诚之言，点到为止。

[注17] 四月中旬，刘承娴的丈夫楼庆西在科学馆三楼意外地看见罗征启，吃了一惊，说：“传说你已经死了，你怎么样？”

这句话并非空穴来风。4月中的一次414会议上，曾有一名总部委员这样说：“罗征启肯定是让老团打死了！他们打死了人，不好交账，就造谣说他逃跑了。我们一定要向蒯大富讨还血债！”

[注18] 团派专案组的打手们企图将罗征启的孩子抓起来当人质，遭到大杂院邻居的

群起反对而没有得逞。

但是后来，“刘冰专案组”的打手们却做成了同样的事。1968年7月，刘冰被关押在200号。在被审讯时，“一个姓孙的头头说：‘刘冰，告诉你，我们已经把你的儿子抓起来了，他交待在家里你骂毛主席，这就是证据，你不交待，也能判你的罪。为了你的孩子，你也应该说吧。’”（刘冰《风雨岁月》135页）

刘冰有四男一女五个孩子，当时在家是两个男孩子，大一点的叫红阳，小的叫夏阳。小的十岁，大的十三、四岁（？）。“红阳和夏阳被蒯大富的人抓去关了一天，红阳被他们打了一顿。”（刘冰《风雨岁月》142页）这两个孩子都受了伤。

[注19]1968年4月23日，414总部委员汲鹏布置李衍平、周家琮、印甫盛、万润南等四名同学护送罗征启南下。其中周家琮和万润南在群里进行了回忆与讨论。有些细节与罗征启的回忆也有一些出入。（详见《附件二：关于“护送行动”的微信讨论与互证》）

[注20]罗书关于文、饶“被送去卫戍区监护起来了”这件事，在韩丁《百日战争》中有所涉及，在拙著《清华七二七事件》一书中采用了这一素材。

第二天（即8月10日）一早，天还没有亮，吕方正与工宣队的干部们就将两派负责人从床上叫起来。-----

这次行动兵分两路：一路由吕方正负责，带着全体团派总部委员都上卡车去200号；另一路则由柳一安负责，带着414的负责人在学校里带路到他们关押俘虏的楼里去。

有一个机灵的团派总部委员在这个关键时刻耍花枪，他在正要出发的卡车边上捂着肚子走来走去，他说肚子痛，急着要跑茅，实在不能去了。吕方正关心地问候了他几句，心想少去一个人也没有什么关系，就让他回宿舍了。但这个团派总部委员离开后，立即打电话告诉团派在南口的人这里所发生的事情。当大队人马到达200号时，名单上的7个“俘虏”有2个已经不见了。显然，这名团总部委员的行为是受蒯大富指使的。

吕方正接着说：-----当得知‘罗、文、李、饶集团’中的两个人被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了，我们非常气愤。蒯大富下命令把李康和文学宓当作反革命送到北京卫戍区去逮捕起来。

罗征启已经逃走了——后来我们把他从广东找了回来。因此那天‘集团’中只有一个饶慰慈得到了解放。

她臀部的伤非常严重，她很长时间既不能坐又不能站，她的身体功能受到了破坏，小便不能控制。她的背上的伤也很厉害，所有这些都影响了她的神经，她的记忆变得很差。

当北京卫戍区把文学宓送回学校时，他差不多是耳也聋了，牙也掉光了，——那是团派在南口的看守拔掉的，他们要他招供，每次当他没有完全照办时，就拔掉他的一颗牙齿。

这全部情况证明，这四个人是被诬害的，团派用拷打逼取供词，然后用李康的话去攻罗征启，用罗征启的话去攻李康。他们有20种不同的刑法。每得到一句有用的供词就用录音机录下来，最后修补整理成一个可供定罪的供词，这些句子可能已完全不是他们自己的原意了。

【注21】柳一安：当时是北京第五建筑公司革委会负责人，具体职务及其职务不详。刘冰书中透露了他是军人出身，罗征启书中描述他是粗眉大眼。

在“清华727事件”中，他是工宣队东区队伍的总指挥。“727”后成为工宣队与清华两派谈判的首席代表，后来担任清华大学革委会副主任，党委副书记。1975年，他与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惠宪君、党委常委吕方正等四人联名写信给毛泽东告迟群的状，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中受到批判。

【资料】

附件一：夜闯三堡

（丁正明、金水高校友 2017.10.20 微信）

丁正明：

大概是1968年4、5月之交吧，我与射击队的金水高决定回到1965年9月至1966年6月我们在那里参加了大半年“四清运动”的京郊延庆县永宁公社去看看。也是射击队员的齐骢比我们低两届，没参加过四清。但愿意和我们一起去。三人成众，说走就走。

我们一早从学校出发，从十三陵后面的山沟进山，天黑前走到一个两边都是陡坡、没有几户人家的村子。找到村干部，村干部很友好地介绍我们到一户农家住宿。我们每人交给老农大概半斤粮票和两毛钱，老农为我们做了一锅高粱面饸饹(大锅烧开水，把和好的高粱面放进一个带很多小眼的半葫芦瓢，上面用力压，高粱面从眼里流到开水锅里，很快就熟了)。

第二天出发翻大山，到山顶，从豁口往北看，远远的四方的永宁城就在眼底。又走了两个小时，到了永宁公社。在那里所见所闻与“三堡”无关，略。

离开永宁回程时，我们决定走大路。三位虽说都忝为“运动员”，走到下半夜也筋疲力尽了。我提议到三堡，看看能否休息一下。

哪知道，我们下半夜闯三堡，竟然把他们整个惊动了。我们当时完全不明白怎么回事：不过是找学校的地方歇个脚，他们怎么如临大敌，对我们凶狠无比？羽毛球队的两位印尼华侨，一个大个子，叫李木松，似乎水利系七字班的；小个子是我们年级、物八的，叫陈奋光。

我们三人被赶出三堡，坚持走到天亮，到达南口火车站。搭火车回到了清华园车站。当时我们并不知道三堡是他们团派的“秦城”，我们误入白虎堂了。没参加过414的任何活动、与“老四”从无瓜葛的我，被“老团”看作414的“探子”了。也难怪，羽毛球队是代表队的团派骨干，游泳队则持“老四”观点者为多数。不同之处是羽毛球队员热衷于运动，参与打人、关人，游泳队却是逍遥派，没人为414效力。航海队孙华栋被打死的那天早晨到地质学院游泳队住地看望众人时都劝他留下，别回学校打仗。他若真留下，也就不会那么惨死了。

“727事件”的次日，即28日，力9的潘安平对我说：“团派要在航空学院开大会，

去不去看看？”我们骑自行车，到北航的大礼堂时，虽然没有坐满人，我不愿意坐下，就和潘站立在最后一面靠着墙站着。没有想到，这样站着就人人能看到我了。蒯大富正在台上讲话时，下面座位中有人大声吼，“有414的奸细在这里……”顿时群情激昂，要“把他揪出来”。会场大乱，老蒯倒是好人，在讲台反复说：“同学们，没关系，我们欢迎……（大意不错）”

陈奋光为首，几位代表队的、我们年级的同学冲上前来，撸起袖子要我滚。我不理睬他们。我根本不怕他们，我看他们未必敢动手。何况老蒯还在台上说好话，意思是不要打。

僵持了一阵，继续呆在那里已经没有意义。我对潘安平说：“我们走吧。”架终于没打起来。

唐山地震时，大个子不幸遇难；数年前小个子在美国病逝。彼此恩怨早已消逝。

2017.10.20 丁

同行者，金水高校友补充：

你对进山的记忆很深。到了三堡，当时老团要关我们，其实我也不认识里面的老团，而且也不是积极分子，不知他们为什么要关我们。估计是怕暴露了他们的据点。后来还是你通过物七的王子瑜说了好话，把我们礼送出三堡，没有受到刑罚。我记得去延庆是在4月3-4日之间，反正就是上旬，武斗之前。回到学校，当时都是自己冲洗胶卷，结果不慎全部曝光，可惜没有留下来延庆的痕迹……

金水高：

丁正明是我的同学，我们一起从延庆步行，准备在三堡休息。因为我们是老四，在三堡被团派所拘。后又因丁虽说是老四，但他却还是老团的工物分部委员，跟同是代表队的（男子排球队）王子瑜（物七）进行了交涉，最后放我们走了。倒也没有受到其它责难与伤害。

【资料】

附件二：关于“护送行动”的微信讨论与相互印证

周家琮：

对罗文“家破人亡，逃离北京”一节的订正：

1. 离开科学馆后，我们几人迳直自东门出校，罗身边有二人，我和罗保持在目力可视距离，不曾在主楼等我半小时，可能主楼会合时花了几分钟，以罗当时心情会觉得漫长。

2. 第二天早晨在民族文化宫附近土建系一女同学家中集合、准备，该同学的家长惶恐不安，催我们快走。上午印甫盛（？）和我去铁狮子胡同人大罗的姐夫处取钱和粮票。

3. 印甫盛没有上火车，我和万润南送罗、李到保定，下车返京。

在保定车站等返京火车时，饥肠辘辘，万从挎包中取出一枚面包，分食之。

老万：（胡按：此时的老万在另外一个群，没有看到周家琮的微信。）

@胡鹏池 罗老师记忆真是神奇，一切都历历在目。有一个细节：送罗、李到保定的可能是我和周家琮，而且周不和我们坐在一起，是为了万一发生意外情况可以施以援手，或者起码可以通风报信。据说是汲鹏的安排，有“黄雀在后”的意思。我在保定下车时周才现身，说明了原委。我当时对汲鹏佩服得五体投地。

周天麒：

象看两党地下斗争的文艺作品。我们这一代人就是看这类作品长大的，有如此周全的脱逃设计也挺正常。不知道那段时间老团保卫组专案组在忙什么？

（胡按：此时，我已将万的帖转给了周家琮，又将家琮的帖转给了万。立刻又邀请万加入了我为群主的《芦花瑟瑟互动群》》，以下是在《芦花》群中的对话）

周家琮：

@胡鹏池 万兄所云部分准确，亦有出入。当晚出清华时我和他们是保持距离的，但后来一直同行。上火车后我坐在罗和李对面，还和罗有简单交流。罗问我姓名、班级，我

对文革表示了几句不满。汲鹏在通知我护送时曾言为何派我？称我还算机灵、可靠、有事尚可应对，更主要是因为平时我罕有抛头露面，派性活动很少参加。与罗等素无交集，这样万一发生意外，方便施以援手，至少不会被一网打尽，有人通风报信。

老万：

周兄提到的土建系女同学可能是建〇的高凯瑜，可以找她核实一下。在保定返京时可能是饿极了，感觉那面包真好吃。反正我后来再也没有吃到过这么好吃的面包。转告周兄：他欠我一顿天下美味。

周家琮：

万兄，那个同学是叫高凯瑜。保定车站面包啖尽，油然想起陈涉言：“苟富贵，毋相忘”。如今请客不难，可中华之大，何处可为你安放一张餐桌呢？

周家琮：

转录要结束了，对所涉亲历细节再作补充：

1. 4月23日晚我和罗投宿政法学院中学同学吴邦增处，吴安徽肥西人，与邦国乃远房兄弟。因宿舍仅有一空铺，我和吴同床抵足而眠。

2. 老四当时经费显然捉襟见肘，所以要去人大罗的姐夫处取盘缠。当时我们也是自带干粮，24日晨在新街口买早点，我欲付款被印阻止，是印掏的钱。

3. 不知为什么，毫无经验的我们风险意识很强。23日晚告诉我们次日晨集合处时，告诉我们问路的人名不是高凯瑜，而是她弟弟，应该是为了防止被问的街坊知道我们是清华的。后从高家去北京站，又提出不乘易遇清华人的一路公交，似乎选乘的是十路（？）公交。■

【本刊声明】

本 刊 声 明

《记忆》创设于 2008 年 9 月，是一份面向民间，面向业余，面向青年的同人刊物。

《记忆》非慈善、非公益。编者尽义务，作者无稿酬。凡认同本刊的宗旨，并取得会员资格者，皆可获得本刊。

《记忆》主张众生平等，凡摆事实，讲道理的文字，无论何门何派，皆可刊发。除特殊情况，《记忆》要求首发。所发文章，不代表编者的观点。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等内容，均受国家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未经著作权人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 xx 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联系信箱：fangxc1966@gmail.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

本期编校：方惜辰

本期封面：邹行